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二十七期
2018年10月，頁171-212
國立台灣文學館

「御都合主義」的社會運動家？
——側議歷史際遇／記憶中的陳逢源及其抉擇

陳明成
台灣首府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摘要

先前已有不少論者透過陳逢源的漢詩創作及其政經專論來探討他長期所參與的文化啟蒙、抵殖運動、知識體系以及後續所延伸的國族認同等爭議。可是根據筆者的觀察，對於一位戰前戰後在熱切變革的「初衷」上大抵內在精神都是暗合一致的知識分子，論者們似乎仍無法較精確地釐清陳逢源為何戰後的形象（特別是在1957年之後）會被逐漸地形塑成截然不同的歷史面貌和出現如此反差的所謂「轉向／轉折」現象？1957年以後的陳逢源便脫離了政治圈，近乎不談政治，無論是反映到歷史與文學，或是後續效應放諸於陳逢源身上，都留下一個非常具代表性的政治文化現象，可惜大多論者忽略了期間陳逢源的精神層面是「如何」一步又一步地全面退卻，以致於結論都較流於表象的批判或善意的曲線維護，如此反而遮掩了我們對更大課題的理解。本文希望能以《公論報》新出土的陳逢源漢詩所提供的「新事證」（包括與李萬居的關係）重新審視陳逢源的歷史際遇與歷史記憶，從而研討他如何在「政治壓迫」的痛切感與「國族認同」的急切性之中不得不依違於當時的政體？強權暴力又是如何介入陳逢源的歷史書寫？最終試著以歷史脈絡的橫切面去修正及補充先行研究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缺憾，藉此提供一個更具省視／醒世價值的背景。

關鍵詞：陳逢源、殖民地、黨國體制、《南都詩存》、《溪山煙雨樓詩存》

An Opportunistic Social Activist?

Discussion on Historical Experience & Memory of Chen Feng-Yuan and His Decisions

Chen Ming-Cheng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Taiwan Shoufu University

Abstract

Some scholars have explored Chen Feng-Yuan's cultural enlightenments, anti-colonialism movements, knowledge systems,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his Chinese poetry and monographs. However, the researcher argues that scholars seem unable to accurately clarify Chen Feng-Yuan's post-war image, an intellectual whose spirit coincided with his "original intention" of participating in reform before and 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 Particularly, after 1957, he was gradually shaped into a completely different historical image. This was a sharp contrast or the so-called "turnaround", although after 1957, Chen Feng-Yuan stayed away from politics and almost stopped talking about politics. This was reflected i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and the follow-up effect on Chen Feng-Yuan, and left a highly representativ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henomenon. Pitifully, most scholars neglected how the spiritual world of Chen Feng-Yuan gradually withdrew which results in a superficial criticism of Chen or a kind intention to preserve Chen's reputation. However, these previous studies have obscure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greater picture of research as regards Chen Feng-Yua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examine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memory of Chen Feng-Yuan based on the "new evidence" (includ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Li Wan-chu) of newly-unearthed Chen Feng-Yuan poem collection from *Public Opinion Newspaper*. On that basis, how Chen was forced to conform to the regime of his time, struggled with the sorrow of "political oppression" and the eagerness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how the “totalitarianism” intervened in historical writings of Chen Feng-Yuan are discussed. Finally, from the analysis of timeline, the shortcoming of “knowing what it is but not knowing why it is” in the previous research is amended so as to provide a more insightful background that can enlighten the public.

Keywords: Chen Feng-Yuan, Colony, Party-State System, *Nandu Poem Collection*, *Xishan Yanyu Building Poetry Collection*

「御都合主義」的社會運動家？
——側議歷史際遇／記憶中的陳逢源及其抉擇

一、從《公論報》新出土的幾首漢詩論起

先前筆者從《公論報》（1947.10.25-1961.03.05）的副刊新出土了不少作家作品，其中也包括陳逢源（1893-1982）的七首漢詩。[1] 陳逢源這位橫跨新、舊文體創作的所謂「二世文人」，[2] 張炎憲曾譽其兼具「浪漫之情與財經之才」、[3] 龔顯宗也評其一生「執兩用中」。[4] 相較於同樣歷經1920年代反殖啟蒙運動的林獻堂、蔣渭水或賴和等人，陳逢源雖然較不醒目，不過這位戰前出身台南地主之家、無論在漢詩或社運界都占有一席之地的「文化仙」，在戰後卻意外地普遍以金融實業鉅子的形象為大眾所周知。如今除了早先由台大歷史系保存下來的「訪談」紀錄外，[5] 目前為止也已積累了不少論者針對陳逢源的漢詩創作、[6] 政經思想、[7] 知識傾向、[8] 國族認同[9] 或全方位的「個人評傳」[10] 等不

1 陳明成，〈祕境與棄兒——初步踏查《公論報》藝文副刊〉，《台灣文學研究》7期（2014.12），頁106-108。

2 根據林莊生的說法，所謂「二世文人」大抵是指一個人「出生在日本領台之後……多半少年時期受過漢文教育，他們漢文雖不如『一世』，如洪棄生、傅錫祺、林幼春、林獻堂，但足以作文議論，吟詩敘懷……」參見林莊生，《懷樹又懷人》（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2.08），頁238。

3 張炎憲，〈浪漫之情與財經之才——陳逢源〉，《台灣文藝》總號92期（1985.01），頁188。

4 龔顯宗，〈陳逢源福慧雙修〉，《台灣文學家列傳》（台南：台南市立文化中心，1997.05），頁221、236。

5 王世慶，〈陳逢源先生訪問記錄〉，黃富三、陳俐甫編，《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台北：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1991.07），頁115-179。

6 例如李貞瑤，〈陳逢源之漢詩研究〉（台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此文偏重生平大要與漢詩解讀的結合，但對於陳逢源的人物特質與歷史定位都缺乏脈絡性的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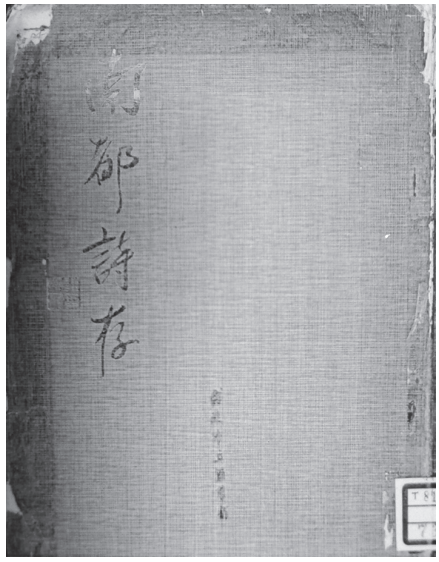
7 例如黃頌顯，〈日據時期陳逢源的政經思想〉，收於氏編譯《陳逢源選集》（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6.10），頁1-29。該文作者基本上不脫離以往中國民族主義式的思維與視野來框限陳逢源的言行，以至於難以突破舊有的論述格局。

8 例如陳翠蓮，《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台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2008.08），頁104-109。此書由於受限通論性質，所以對於陳逢源整合日本學者所建構的人格主義及文化主義之知識傾向只有精要地陳述，並未特別安排專章進一步討論。

9 例如陳信行，〈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國族認同之轉折——以林獻堂、葉榮鐘、陳逢源三人為例〉（台南：台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全文就論及陳逢源的部分而言，很顯然有去脈絡化誤讀及東拼西湊之嫌。

10 例如謝國興，《陳逢源：亦儒亦商亦風流（1893-1982）》（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2.06）。本書資料豐富、架構完整，特別是蒐集了不少不易取得之訪談；但每遇爭議或尷尬之處多採迴避、淡化或偏袒傳主，與前述「註腳3」及「註腳4」的書寫策略較為近似。

同的議題進行過介紹及探討，其中以藍士博近年來所發表的相關論著最多而其取得的成果也相當豐碩。[11]



圖一　《南都詩存》封面（台南：自印本，19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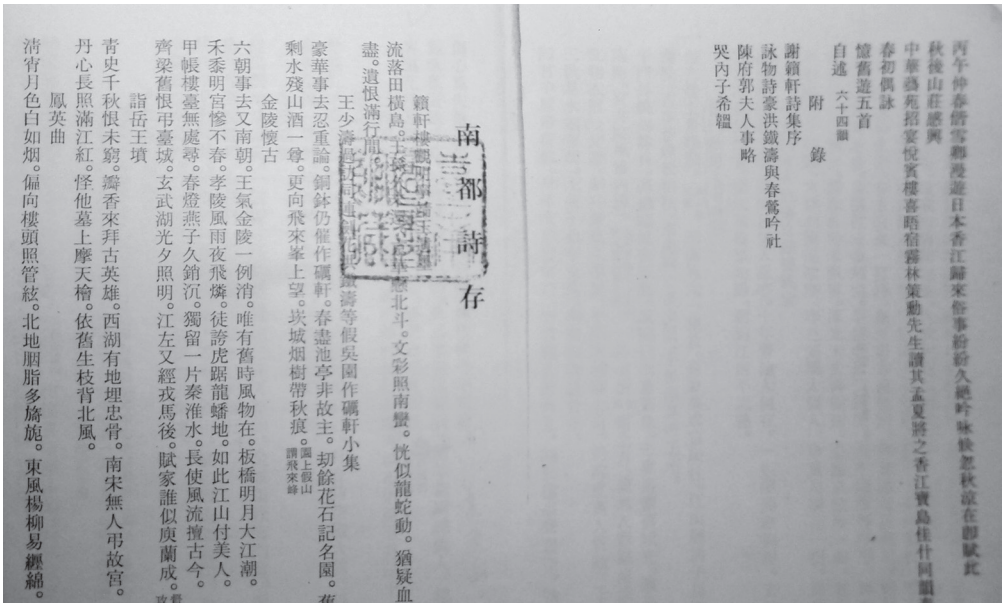
在藍士博的論述中，最主要是從「知識傾向」與「國族認同」兩個層面來開展「陳逢源研究」的可能性。[12] 他認為陳逢源身為一位東亞「文化交疊區域」的新式知識分子（有別於前述的「二世文人」），戰後卻馬上交出〈台灣光復陳行政長官公洽蒞臨喜賦〉[13] 這樣的作品，「明顯地便是在向國民黨政府交心表態」，並且事後又透過自己所擅長的漢詩書寫迅速地與劉啟光、于右任、曾今可等得勢的「半山」或國民黨的外省權貴交往，過程中不但是主動「改寫詩作」[14] 來呼應「民族」氣節、「創造了他個人在戰前的『遺民化』色彩」，還成功地透過這些「靠山」前後擔任過諸多企

11　藍士博的論著中涉及陳逢源的相關作品，至少有（1）藍士博，〈從「差序」到「對立」：戰爭時期台灣旅人陳逢源的中國遊記〉，「第一屆東亞文學與文化年輕學者國際研討會」論文（東國大學韓國文學研究所、日本名古屋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台灣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聯合主辦，2010.02.08）；（2）〈從傳統文人、知識分子到印刷媒體世代〉，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主編，《第七屆全國台灣文學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國立文學館，2010.11）；（3）〈日治時期台灣印刷媒體「世代」的誕生暨陳逢源個案研究〉（台北：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4）〈國民身分的代價——以陳逢源（1893-1982）個案談戰後台灣人的中國人形象與文化認同〉，《文化研究雙月報》125期，2012.02.25（來源：http://www.csat.org.tw/journal/Content.asp&JC_ID=562，檢索日期：2015.11.17）；（5）〈台灣知識分子的形成與轉折——以陳逢源（1893-1982）為例〉，《台灣史學雜誌》15期（2013.12）。

12　在「註腳11」所列舉的幾篇著作裡，以較晚刊載的（4）、（5）兩篇與本文的論述旨趣最具相關性。

13　陳逢源，〈台灣光復陳行政長官公洽蒞臨喜賦〉，《溪山煙雨樓詩存》（台北：龍文出版社，1992.03），頁53。

14　陳逢源最早曾於1962年時，彙輯過往的詩作而題為《溪山煙雨樓詩存》（台北：出版者不詳），當時卻為了要符合國府的抗戰史觀，以及中華民族氣節，而將日治時代的部分舊作加以增刪、改寫（計有44首，其中就有七首內容原先非常不「政治正確」），這些異動情形藍士博已做了很好的整理，可參見藍士博，〈台灣知識分子的形成與轉折——以陳逢源（1893-1982）為例〉，《台灣史學雜誌》15期，頁86-87。另外按筆者所查，1972年時，陳逢源應當時的「中華詩學社」社長易君左因籌編「四海詩心」專集之邀而自選舊作二十題交付，事後陳逢源增添數作——包括〈詠物詩豪洪鐵濤與春鶯吟社〉、〈謝籟軒詩集序〉等文——再自行印成小詩冊，題為《南都詩存》（台南：自印本，1972），但當初只分贈少數同好，因此坊間甚少流傳（可參見圖一、圖二）。1980年時，除彙輯先前兩本詩存作品外，再補上後來新增之作，仍題曰《溪山煙雨樓詩存》（台北：自印本，1980）。1982年陳逢源逝世。1986年12月，由「陳逢源先生文教基金會」再版《溪山煙雨樓詩存》。本論文所援引的詩作，則一律出自1992年3月據1980年排印本影印的「龍文版」。



圖二　《南都詩存》（台南：自印本，1972）部分目錄及內頁

業的要職；這些陳逢源於戰後為取得「國民身分」的認可而付出的「代價」與得到的回饋，其中明顯「存在著與國民黨之間的『對價關係』」。緣此，藍士博歸結出由於改寫過往的「身世家國」、一心一意想「成為中國人」的諸般現象，陳逢源其實代表著戰後知識分子的某種「轉折」類型。[15]

事實上，戰前尚且懷抱「將伸曲蠖何妨屈，未死寒灰合再燃」[16]的陳逢源，其熱切變革的「初衷」在戰後初期並無多大變異，他與陳逸松、蘇新等人還曾一度摩拳擦掌共同組織了「台灣政治經濟研究會」（其機關誌為《政經報》），也與當時正致力於「為民喉舌」的《公論報》創辦人李萬居時有往來。單就目前筆者所發現的新資料來說，1957年之前陳逢源至少在《公論報》上發表了十五首漢詩，[17]其中兩首便是寫給李萬居。在陳逢源普遍傳世的詩集《溪山煙雨樓詩存》（以下簡稱《詩存》）裡涉及戰後與台籍人士（包含「半

15　以上整個段落的引文，皆引自藍士博，〈台灣知識分子的形成與轉折——以陳逢源（1893-1982）為例〉，《台灣史學雜誌》15期，頁83。

16　陳逢源，〈癸亥春偕蔣渭水蔡峰山為台灣議會請願代表將赴東京蒙林南強暨稻江諸同志假江山樓餞別〉，《溪山煙雨樓詩存》，頁12。

17　在十五首漢詩創作中，有七首事後並未被收入《溪山煙雨樓詩存》，可參見陳明成，〈祕境與棄兒——初步踏查《公論報》藝文副刊〉，《台灣文學研究》7期，頁106-108。

山」）酬唱往來的作品是較為稀有的，特別是政治人物。若由此來看，這段時期橫跨在陳、李倆人之間的政商情誼便顯得異常值得關注。可是，1957年時陳逢源出乎外界預料，不只突然辭卻續選第三屆的省議員，還徹底脫離了政治圈，從此幾乎不談政治。無獨有偶地，筆者注意到了此時言論愈趨激烈的《公論報》也未再出現陳逢源的作品，更遑論詩人將詩作賦呈李萬居「郢政」之類的舉動。諸般跡象似乎都同時在預告陳逢源自此從政治社會的運動場域全面退隱而正走向與李萬居所主持之《公論報》截然不同的道路。

或許誠如藍士博等人所說的，陳逢源的言行確實已構成「交心表態」或施展「登龍術」之類的諸種評價；可是，為何一個人的思想言行，戰前與戰後會出現如此不連貫的現象？出於「民族主義」的情結？基於明哲保身的考量？抑或不對等的權力關係……？果真如鍾理和所說的，這是個「搖身一變的時代與搖身一變的人們」？[18] 論者們似乎最終仍無法更精準地釐清陳逢源何以戰後的形象（特別是在1957年之後）會被逐漸地形塑成截然不同的歷史面貌和出現如此反差的「轉折」現象？假如直接陷入表象的「結果論」，缺乏將人物的行為、質性與同時代的歷史脈絡及社會事件進行有效的「橫向連結」，又會免不了出現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遺珠，更讓我們失去省視背後形成原因的機會。依據筆者的觀察，其中最大的關鍵點在於忽略了陳逢源從戰後到他初次出版那本遭到自己「塗改身世」的漢詩集甚至是接受「訪談」之前，這二十年間（1945-1967）特別是1957年卸任省議員的前後，其精神層面遭到何等衝擊與煎熬、他是如何一步又一步地全面退卻的變遷歷程。這些挫敗拉扯、掙扎扭曲，無論是反映到陳逢源詩作，或後續效應放諸於陳逢源身上，想必才是更迫切的課題。

如今，本文除了藉助《公論報》新出土的陳逢源漢詩所提供的「新事證」重新考察那些原本被掩蔽的隱晦心跡與歷史碎片之外，也將階段性地時而援引戰前與陳逢源兼具抵殖民脈絡的賴和、蔣渭水、林獻堂，以及戰後李萬居等人的事誼或作品來進行輔助性說明，俾使在前人已取得的成果上再度審視陳逢源

18 鍾理和，《鍾理和日記》（高雄：財團法人鍾理和文教基金會，1996.10），頁12。

的歷史際遇／記憶，從而研討他如何在「政治壓迫」的痛切感與「國族認同」的急切性之中，不得不依違於當時的政體？強權暴力又是如何從碾壓肉體及精神壓迫到介入陳逢源的歷史書寫？最終試著連結政治事件與歷史脈絡的橫切面去修正及補充先行研究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缺憾，藉此提供一個更具省視／醒世價值的背景。

二、故國黍離的身心效應

陳逢源曾自言：「少喜吟詠，好讀唐宋詩詞。……數十年滄桑多變，年事亦老，所樂者詩也」[19]，著有「陳逢源評傳」的謝國興也認為：「陳逢源在世九十年，……可謂一生無缺，而其中逢源最看重與最投入的，恐怕仍是詩。」[20]一生可說愛讀詩並勤於漢詩創作的陳逢源，平日藉由詩會雅集、友朋酬作時詠史懷古，自然是出於這股情思而在日治時期時開展了「故國」[21]之行的成分居多。

「故國」之行前，陳逢源詩作中的「故國」較多指涉歷史上的中原歷朝，至於「台灣民主國」的主題則幾無留下完整創作，可能與他對「台灣民主國」式的動機不純、不足成事又徒增傷亡的理解有關，也顯見像「台灣民主國」這類已預知需武力相向的選項，大抵讓他地主出身、一向習於「不涉險」的中產調性比較無法「隨之起舞」。[22]至於歌詠歷史人物的詩作，陳逢源則在不直接臧否鄭成功的情形下，卻認為施琅能忍一時私怨而從長計議，實為高瞻遠矚，追念他「平台一戰仗奇謀，來拜衣冠靖海侯。我讀將軍留棄疏，始知高論卓千

19 陳逢源，〈自序〉，《溪山煙雨樓詩存》，頁13。

20 謝國興，《陳逢源：亦儒亦商亦風流（1893-1982）》，頁353。

21 「故國」幾乎涵蓋了時間、空間以及文化層面的意涵。大抵指中原歷來更迭的朝代或國家，晚近的可說就是指曾經實質統治過台灣的「大清帝國」及對岸承繼它的「中華民國」；當然也可以同時指精神上的漢文化發源地（精神上的母國）。

22 王世慶，〈陳逢源先生訪問記錄〉，黃富三、陳俐甫編，《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頁166。反觀賴和，他特別對維持148天的台灣民主國充滿無限的追思，如吟曰「旗中黃虎尚如生，國建共和怎不成。」（〈讀台灣通史十首〉之七）、「先民走險空流血，後人弔古徒有詩」（〈讀林疋氏黃虎旗詩〉），一再對先人的行動及代價感到振奮又扼腕。見賴和著，林瑞明編，《賴和全集・漢詩卷》下（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06），頁322、446。

秋」，[23]對於他力排眾議上疏取台、留台之舉甚為讚揚。[24]

1922年暮春，陳逢源終於一償宿願首次遊歷「故國」月餘。行前在「南社」友人的餞別席上，陳逢源賦詩：「儘有餘情縈故國，已無多淚灑新亭。槎浮海上非徐芾，帽掛遼東老管寧」，[25]藉由「徐芾」和「管寧」的典故，顯示此行頗有長居、創業的打算。可是一路下來，很多時候只見中國各方皆呈骯髒墮落、殘破不堪的局面，一時遊興雖然未減，但是從「荒煙蔓草寒山寺，端賴詩人得盛名」、[26]「墳廟無端感廢興，殿堂久已失威稜」[27]前後兩段的詩句可揣，其失望之餘流露出原有的想像與期待已漸有轉變：對文化故國雖說不可能不帶情感，可是面對現實中國則又難以貼近。同樣是對「故國」懷有孺慕情愫的賴和，25歲（1918）時隻身前往廈門鼓浪嶼的博愛醫院。就當時留下的漢詩來看，與陳逢源多有類似無以名狀的苦楚又難以言喻的失落。[28]賴、陳兩人一前一後的「故國」之旅，同樣帶給他們歷史現實的覺醒，也唯有親涉這趟衝激的歷程才足以全力啟動他們日後投入社會運動的內在趨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故國」之旅前陳逢源詩句中頻仍出現像「遺恨滿行間」、「古今興廢問青山」、「可憐歷歷興亡恨」、「半局殘棋殿六朝」、「民族興亡一愴思」、「忍淚浮舟過馬關」[29]裡的「遺恨」、「青山」、「興廢」、「興亡」、「六朝」、「民族」、「忍淚」等飽含「故國」情愫的字詞，顯然陳逢源及同時代多數的所謂「二世文人」多具有一定程度的「遺民」遺緒，此種近乎身心剝離的歷史糾結，矛盾、尷尬又無可奈何的境地，很難令

23 陳逢源，〈甲戌自基隆乘新造船高千穗丸抵澎湖詣施琅祠〉，《溪山煙雨樓詩存》，頁19。

24 在賴和大量歌詠歷史人物的作品中，以鄭成功的周邊事蹟較多，最早一首寫於廈門時期的〈秋日登日光岩絕頂〉，曰：「誰使英雄終有恨，頓教豎子浪成名」，對鄭成功未竟的志業深懷悵惘，當然視施琅的「功業」為一種豎子的行徑。再看其在〈施琅墓道碑〉評說：「靖海功勳終泡影，世間爭說鄭延平」，對施琅的歷史定位與陳逢源大異其趣。見《賴和全集・漢詩卷》下，頁385、392。

25 陳逢源，〈壬戌春東渡扶桑西遊禹域留別南社同人〉，《溪山煙雨樓詩存》，頁8。

26 陳逢源，〈吳門紀遊〉，《溪山煙雨樓詩存》，頁9-10。

27 陳逢源，〈奉天詣清太宗北陵〉，《溪山煙雨樓詩存》，頁29。

28 表現賴和親歷「故國」後的失落感的漢詩實在不少，例如〈和笑儂君惆悵詞錄三首〉、〈同七律八首〉、〈入秋〉、〈於同安見有結帳於市上為人注射瑪啡者趨之者更不斷〉、〈中秋寄在台諸舊識〉、〈廈門雜詠九首〉等，詩中多充斥著「陸沉、妖雲、草菅、瘡痍、蠱病、蠢豕、睡獅、殺伐、戰爭」等驚心動魄的描繪字眼。見《賴和全集・漢詩卷》下，頁325、376、383、393、384、385。

29 分別引自《溪山煙雨樓詩存》裡的〈籟軒樓觀明寧靖王遺墨〉、〈丁巳春鶯吟社同人竹溪寺修禊〉、〈讀吳梅村詩集〉、〈題桃花扇〉、〈赤嵌樓懷古〉、〈舟次馬關〉，頁1、2、2、2、3、6。

我們不正視其中確有「漢文化／民族意識」對陳逢源等台灣文化精英的內在影響。可是，同時我們也必須觀察到就在第一次「故國」之旅後，這些富有「故國」哀思的語句不僅近乎「一掃而空」，代之而起的盡是新時代青年所懷抱的「是非終有日，莫抱落花哀」、「且待城南謀二頃，漫誇筆陣掃千軍」[30]的昂揚企盼，同時筆者也注意到了所有後來被塗改身世、明顯以日本國民的立場來看日中時局的舊作，恰好全是陳逢源分別於1934年、1938年再度西遊「故國」時在旅程中所完成。這個轉折現象很可惜地卻在戰後「黨國體制」[31]的規訓與收編下，一方面出自陳逢源本身「政治正確」的需要而自個將部分疑似傾向「皇民」立場的字句更動為符合中華革命史觀之舉，另一方面由於陳逢源故後包括其家屬、友朋在戒嚴時空下都「順理成章」將其詩作全與故國遺民、中華文化連結在一起，整本的《陳逢源先生紀念集》（又名：陳逢源先生哀榮錄）——特別是集子裡的〈陳逢源先生事略〉乙文——成功地將詩人的一生經歷與社會形象形塑為「愛國的民族主義者」[32]。致使長期以來，部分的論者即使明知陳逢源曾有「故國」失落之旅，卻仍就「不察」（或是「執意」）將其一生的漢詩書寫毫無差別地全定位為「寓漢民族意識於詩情的情懷」[33]，或說成「充滿了凜然不可侵犯的中華民族之正氣」[34]，完全不考量「漢詩創作」（包括漢字漢文的使用）在當時東亞漢字文化圈的殖民統治中並未被完全蒙上單一國族的政治色彩，在一定的程度上它不僅是東亞各地共享的文化遺產與交流媒介，也另具獨特的權威財、知識生產財、教養消費財，更是一種殖民者對受殖者的統治手段，漢詩的創作是否全是「故國黍離」的折射認同，實有商榷

30 分別引自《溪山煙雨樓詩存》裡的〈寄南社詩友〉、〈極目〉，頁15、19。

31 「黨國體制」在本文所指，簡略地說就是在國民黨政權掌握絕對的權力下所施行的政體，亦即「以黨領政」對國家機器的運作全面掌控，並且「以黨治國」完全凌駕於司法及執法機關，一般國民若要參政，幾乎都得先成為黨員，同時黨員之資格亦須由黨單方面來決定；社會上的政經、思想、結社等活動，無不受到其嚴密的監控。

32 見陳逢源先生治喪委員會編，《陳逢源先生紀念集》（台北：陳逢源先生治喪委員會，1982），頁223、251、260、320、366。事實上，比《陳逢源先生紀念集》更早出版的《南都詩存》（1972）裡有篇林熊祥所寫的〈陳府郭夫人希韞事略〉（頁17），當時林氏就已稱頌陳逢源在日治時代為「保持中國文化不絕如縷」而不斷從事漢詩創作。可見陳逢源戰後的「中國（華）民族主義者」形象在其生前就不斷有意無意地經由各式親朋的各種敘事進行形塑。

33 黃頌顯，〈日據時期陳逢源的政經思想〉，《陳逢源選集》，頁3。

34 王曉波，〈「治警事件」的二志士：敬悼陳逢源與蔡培火先生〉，《中華雜誌》235期（1983.02），頁45。

餘地。[35] 同時也值得注意的是，陳逢源親身跨境過「故國」與日本「內地」數趟，停留的時間都不短，處在如此「故國」與「新邦」交替的夾縫地理及前後鉅大變異的語境中，難免讓陳逢源在長期「地景」的移動經驗裡逐漸萌塑了異於以往（尤其是指「1931年滿州事變」前）的視點，書寫「漢詩」時的「心景」料想早已不是戰後黨國指稱的「故國」餘緒所能粗糙概括了。[36] 譬如陳逢源於1939年出版的《新支那素描》[37] 這本遊記，字裡行間可說已完全不自覺地透過日本現代化觀點、文明尺度以及身為先進者的位階來觀看「故國」，素描的內容便是此一轉折的最好註腳。

1911年自國語學校畢業後由於對繼承家業全無意願，陳逢源旋即進入「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台南出張所擔任基層雇員，無異讓陳逢源對於殖民地本質有了更深刻的體悟。兩年後（1913），陳逢源便開始較有系統地從事漢詩創作（《詩存》亦是從這年開始收錄），多少跟有感於身處異民族統治及工作上日台差別待遇有關。[38] 他曾在只分贈同好的《南都詩存》裡自敘：「余自幼處於日治惡劣環境下，不為所屈，猶酷愛吟詠，一傾積愫……」[39]，某種程度顯露他從事漢詩書寫，除了部分是以殘存的「故國」遺緒在現實中不斷地召喚「漢民族意識」來向殖民者強調「我跟你不同」的心跡外，更多時候對他而言，漢詩的書寫更重要的是對眼前政經文化的多重壓迫與剝削作為一種心理層面的「抗拒／逃避」策略[40]；亦即身處帶來現代性的殖民地上，陳逢源是如何在

35 關於「漢詩創作」（包括漢文漢字的使用）在殖民地台灣（日治時期）的特性和時代意義，可進一步參考陳培豐，《想像和界限——台灣語言文體的混生》（台北：群學出版公司，2013.07），頁6、8-9、15。

36 關於日治時期台灣人由於台、日、中三處「地景」的跨境，隨之「心境」產生變化，以及以日本國民身分進而抱有帝國「進出」中國的意識形態、日中應協力建設新東亞秩序的集體現象之相關探討，可參閱曾巧雲，〈往返之間：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的中日移動經驗與夾縫地理〉（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頁167-189。

37 陳逢源，《新支那素描》（台北：台灣民報社，1939.04）。

38 陳逢源在「三井」時其薪津與同職等日人比起來不到一半，同樣是覺悟到工作量較多且苦無升遷機會、比起陳逢源晚幾個月出生的賴和，便曾藉由小說〈阿四〉裡的青年醫生阿四來直接控訴這種對台灣人而言很具代表性的遭遇。參閱賴和，〈阿四〉，林瑞明編，《賴和全集・小說卷》（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06），頁265-275。

39 陳逢源，〈自敘〉，《南都詩存》，無頁碼。

40 「抗拒」與「逃避」有時可說是心理層面的一體兩面，陳逢源曾提到他在與友人自組的「春鶯吟社」時代，「眼看日人之榨取政策與民族差別頗不順眼，常抱不平，然強權在上毫無回天之力，故常浪跡歡場沉溺於醇酒美人，是時予常招集同人於醉仙樓、寶美樓等地開尊吟咏……」主觀上毫無疑問陳逢源想抗拒，但客觀上卻無可奈何，遁入漢詩的書寫世界便成為陳逢源最個人的慰安之處。引自陳逢源，〈詠物詩豪洪鐵濤與春鶯吟社〉，《南都詩存》，頁14。

殖民監控無所不在的歷史現場中，迫切地想找到一個既能時時刻刻「批判」內、台差別又可「迎拒」時空上新舊交替的自處之道？尤其是在殘存餘緒漸褪的「故國」之旅後，同時欽羨現代性的追求又要面對日方強制推展「同化」政策之時？[41] 此刻書寫漢詩豈無帶有一絲「抗拒／逃避」的意味？事實上東遊西渡後的陳逢源，因緣際會加入「台灣文化協會」而捲入一場「時代劇」，其不同形式的創作在性質上已大有轉變，漢詩書寫幾乎已是既不願理所當然完全同化於「大和民族」，也做不到義無反顧成為「祖國派」的陳逢源，在面對本土語境與心景時矛盾、掙扎之餘既適性量力又較個人化的「戰鬥位置」了。

三、治警事件的迴異道路

1921年2月由林獻堂、蔡惠如等人領銜向日本第44次帝國議會提出「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書」，正式開啟了日治時期前後持續14年（1921-1934）、共提出15次請願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以下簡稱「議會運動」）。同年10月17日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以下簡稱「文協」），其功能之一即是擔任幕後推動議會運動的動員機制。陳逢源與賴和、蔣渭水、林獻堂等均列名「理事」。

不料到了1922年10月，林獻堂在台灣總督府釋出的壓力下，即表示不再於第三回的議會運動中領銜，爆出所謂的「八駿事件」。[42] 事件的爆發雖是令眾人有些錯愕，但對陳逢源卻深具兩重意義：首先是1923年的第三回赴京請願之事，陳逢源臨時受林獻堂之託代為前往日本進行遊說，自此思想及行動才轉為

41 在〈亞細亞の復興運動と日本の植民政策〉乙文中，陳逢源之所以主張「文化主義」與「自治主義」，最主要的也都是出自於冀望在高壓的殖民地裡能否善用台人既有的文化歷史去「抗拒」日人「同化政策」的考量，與書寫漢詩時的「對抗」思維有著高度相似概念。參考：陳逢源，〈亞細亞の復興運動と日本の植民政策〉，《台灣》4年1號（1923.01.01），頁18-33。

42 1922年9月29日，林獻堂偕同林幼春、洪元煌等共八人謁見台灣總督田健治郎，尋求其對議會設置運動的諒解。但田總督直截表示請願一事在殖民體制下絕無機會成功，並當場要求林等放棄。事後總督府也透過勸退及銀行催逼等動作，終使林獻堂表示不再於第三回的請願中領銜，此即所謂「八駿事件」。參閱周婉窈，《日據時代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北：自立報系文化出版部，1989.10），頁79-80。

圖三　圖片取自謝國興，《陳逢源：亦儒亦商亦風流（1893-1982）》，頁99。

積極活躍；[43] 另外，由於林獻堂在事件中所展現的「妥協性」，對日後陳逢源於「肆應」不同變局時起了相當程度的啟／暗示。在「台灣文化協會第一回理事會」（1921年）出席人員大合照這張出了名的相片裡（圖三），中坐者是當時像似已胸有成竹的林獻堂，其右手邊的蔣渭水則是顯得冷靜拘謹些，在後排右方第三人正是當時躊躇滿志的陳逢源，站在陳逢源左後方的賴和反倒像是突如其來的闖入者，畏怯又遲疑地探著頭瞄往前方。事實上，一開始賴和對投入文化啟蒙運動多少因開業醫身分而在四人之中確實最顯遲疑顧忌，但正如「註腳38」提及的自傳性小說〈阿四〉裡的青年醫生阿四，需在備嘗日台極端不合理的差異對待後，才「心胸頓覺寬闊了許多」[44] 終於覺悟他之前所抱的不平、痛苦以及憤恨，皆種因於種族壓迫、經濟剝削與文化懵昧等，所以一旦決心成為社會運動者，賴和似乎就不曾停歇下來。證諸事後的歷史發展，如新舊「文

43　1922年7月左右，陳逢源第一次往謁林獻堂受其相當大的鼓舞，也促使陳逢源日後無論在辦報、議會請願、政黨參與、金融事業等都一直與林獻堂保有相當密切的互動。

44　賴和，〈阿四〉，《賴和全集・小說集》，頁270。

協」的路線分裂、林獻堂與陳逢源等人發起請願運動廢止之舉等，[45] 一禎歷史影像像似一則歷史「反諷」。

由於蔣渭水所號召的外圍組織「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趁第三回請願運動在東京活動時，將此在台原被禁止的結社重新於日本本土登記，台灣總督府卻以此舉違反了「治安警察法」為由展開全台搜捕，實際上純為壓制風起雲湧的議會請願及其帶動的殖民地自覺運動，此為「治警事件」（1923.12.16-1925.05.10，約持續一年半），陳逢源與賴和、蔣渭水均在逮捕名單。至1924年1月7日，包括賴和在內已有11人因不起訴釋回，共監禁22天；但陳逢源、蔣渭水等在押17人被正式起訴。

前後被監禁了54天的陳逢源，出獄後雖受到英雄式的歡迎，卻憂戚地發出「一獄成名太簡單」的自嘲，[46] 想必一貫自信掌握實情、洞察局勢的他已看出現實裡個人意志與「政治機會結構」存有極大的落差。[47] 從行動之初「將伸曲蠖何妨屈，未死寒灰合再燃」的激揚，至繫獄時「不因局促悲囚繫，卻喜孤高尚瘦狂」的慷慨，[48] 可是隨著囚禁的日子一久、官司勝訴的機會愈趨渺茫時，他也開始對抗爭成功的可能性有所動搖，出獄時已深感空負盛名了。陳逢源的無力感全反映在「滿街爆竹響連天，深愧無從解倒懸。已覺自由非易取，徒揮赤手抗強權」這首詩裡。[49] 自此陳逢源對往後的運動前途始終是抱持著審慎、保守甚至愈趨悲觀，戰後陳逢源憶及此時的行動，就曾歸咎於「強權在上毫無回天之力」。[50] 反倒是賴和的感受並非如此，「治警事件」使他更清楚體認到

45 1934年9月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後半階段（第9次至第15次），內部因先後文協分裂、民眾黨分裂，外部又有總督府漸採強力壓制，林獻堂等人已漸感無實現之可能，遂邀部分同志共商，最後大家接受陳逢源的提議，共同發表「台灣統治意見書」及「請願運動停止聲明書」。由此便可看出陳逢源頗為「務實」的一面。參見台灣總督府著，王乃信等譯，《台灣社會運動史・第二冊：政治運動》（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06），頁112。

46 陳逢源，〈乙丑春連坐台灣議會事件台北高等法院最終判刑禁錮三個月同烽山囚禁台南監獄寄懷劉明哲〉，《溪山煙雨樓詩存》，頁15。

47 「政治機會結構」（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一詞是政治學與社會學的分析概念，指的是統治當局對政權參與的開放程度、對抗團體之間聯盟的可能性、敵我或競爭陣營中菁英之間的分裂與奧援等因素的交互架構。參閱王甫昌，〈社會運動〉，王振寰、瞿海源主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99），頁501-536。

48 陳逢源，〈甲子春移禁台北監獄〉，《溪山煙雨樓詩存》，頁14。

49 陳逢源，〈刑期提早出獄與峰山備受台南市民歡呼有感〉，《溪山煙雨樓詩存》，頁16。

50 陳逢源，〈詠物詩豪洪鐵濤與春鶯吟社〉，《南都詩存》，頁14。

自己身為受殖／抗爭者的定位，愈是強化了他今後與殖民強權周旋拼鬥的覺悟。[51]「治警事件」的前後，對陳、賴而言恰好都各自是一種煉就「完形」的歷程。

但是，到了日軍襲擊珍珠港的當天（1941.12.08）賴和被以「莫須有」的罪狀再度下獄時（1941.12.08-1942.01），他當時所留下的〈獄中日記〉裡便有幾首漢詩是如此記著：「不耐為囚苦，何日得自由」、「家將破滅心猶繫，愁苦填心解脫難」、「高堂憂患因兒女，家計艱難幾弟兄」[52]……。如果將賴和此時詩境所透露的從平靜期待、不安憂煩到摧折疲羸，與抵殖民運動日愈艱難的實情兩相對照，後來的歷史發展似乎較為貼近陳逢源之前對時局的評估。

大抵陳逢源就是認為，大張旗鼓的抗爭以致「無謂犧牲亦不值得」，尤其在當時「政治機會結構」與「大環境」愈趨僵化及緊縮的氛圍下，實際上任誰都無法在日本軍警的高壓下大有作為，「倘有異論者，則被視為非國民，非法凌遲」，若急於求成的話反倒易於被對方趁勢利用或一舉消滅，所以「除非日本戰敗以外是無法成功的」，平日也只能「在強大的日本軍、警力下最少限度的去行動」。[53]相較於壯志未酬的賴和，[54]此種至多在既定權力架構下或體制內謀求漸進改革的思考立場，也為夾縫中求自得的陳逢源等人，不管是戰前或

51 賴和打從被捕入獄，就以「我向鐵窗三日坐，心同面壁九年人」（〈繫台北監獄〉）自惕，待到出獄時領受的是「誰知到處人爭看，反似沙場戰勝歸」（〈出獄歸家〉）的深情敬意，當時賴和熱情激奮、轉挫為勇，〈吾人〉寫道：「世間未許權存在，勇士當為義鬥爭」便是此時心跡的最佳表白。以上引自《賴和全集・漢詩卷》下，頁425、428、458。另參閱林瑞明，〈賴和與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賴和研究論集》（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93.08），頁166。

52 以上皆引自賴和著，林瑞明編，《賴和全集・雜卷》（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06），頁25、35、44。

53 以上引文皆引自王世慶，〈陳逢源先生訪問記錄〉，黃富三、陳俐甫編，《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頁145、159。若與賴和相較，陳逢源至少在思想層面上顯然較缺乏賴和在欲求外部權力條件改變時所隱含的「暴力」傾向。此處的「暴力」當然不只是指拳頭抗暴的表層意義，更涵蓋推翻現狀取而代之的指涉，賴和的這種傾向除典型地表現在新詩〈南國哀歌〉等，更多是寄託在小說文本，譬如〈新時代青年的一面〉裡剛留學回來的青年對法官說：「是現在犯到最大的罪的人才曉得真理，才抱有純正的人格。」想對現行法律進行「翻轉」，並且還直接挑戰說要對象徵殖民統治的巡警：「我不是要用暴力撲滅他，是要把鮮血來淘洗他呢！」亦即悍敵當前時，血液中比起習於「穩健」的陳逢源，賴和多了一股「拼氣」。參閱《賴和全集・小說卷》，頁59-60。

54 賴和獄中曾喟嘆：「看看此生已無久，能不能看到這大時代的完成？！真是失望之至。」（〈獄中日記〉，頁49）不意最後仍舊無法逃脫時代的摧折。賴和過世時，陳逢源賦有〈哭賴懶雲〉：「玉石如何可並焚，吾徒竟失鷺鷗群；良醫自古如生佛，執友何人最哭君。復社文章遭妒忌，東林裙屐等煙雲；磺溪抗手題詩後，鶴唳華亭不再聞。」（《溪山煙雨樓詩存》，頁49）可說是一面贊其風骨，同時也惕勵自己吧。

戰後，一直帶來備受詬病的「原罪」。[55]

四、實踐哲學與時代課題

（一）實踐哲學

由於陳逢源長時間擔任高階的記者（如任職《興南新聞》與《台灣新報》的經濟部長）及參與金融經營（如任職「大東信託」、「台灣信託」時期），在文學界又較多與林獻堂、林幼春、謝籟軒、櫟社等主要從事舊文學創作或地主階級酬作往返，處世應對的手腕相對地也會來得較拘謹權宜，正如詩句「輒以直言招物議，未妨冷眼看時流」[56] 所言，下筆時往往已習於幾分的保留；有時出自理智的考量他寧可委屈，以待日後保有僅餘的發聲機會，為的就是「一枝禿筆莫輕投」[57]，才不致於因一時言論的過激被捕、被刪而帶來「無謂之犧牲」。

如今就其前後在《台灣》、《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興南新聞》、《台灣新報》等所發表的多篇論述來看，其主要的內容和形式不論是較偏向殖民主義的揭露、近代西方思潮的闡揚，抑或呼籲地方分權的落實、島內財稅金融的改革等，[58] 陳逢源除了事先數據都調查得很詳細、有憑有據、言之有物之外，也能顧及論述內容的實踐性，當然最要緊地他都盡可能自我警醒在殖民政權的法律尚能容忍的範疇內來運作。

但畢竟因地主出身、長期中產生活以及囿於文學網絡這層因緣，雖主觀上陳逢源有十足意願與普勞大眾站在一起，卻一直缺乏共同生命體驗，因而觀其漢詩創作上自然少有殖民挫辱或時代棄絕的幽闇書寫，在取材上確實也遠不如

---

55 「原罪說」可引當年「台灣民眾黨」要角之一的黃旺成的說法為代表。黃旺成認為以蔣渭水為中心的台灣民眾黨之所以左傾後卻在1931年2月18日被總督府下令解散，肇因於陳逢源、林獻堂等另組妥協性高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此舉致使台灣政治運動大打折扣甚至退回原點。對於背負「原罪」的指責，陳逢源認為那是因為批評者沒有了解日本帝國主義的嚴厲性，不過他到底也還是同時主張「被壓迫而不加以反抗也不行，否則會窒息。」就算整個政治社會運動的開展無法徹底，最終總是多少「有些效果」的。分別參閱王世慶，〈黃旺成先生訪問記錄〉、〈陳逢源先生訪問記錄〉，黃富三、陳俐甫編，《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頁90-91、159。

56 陳逢源，〈聞華北華中新政權成立有感〉，《溪山煙雨樓詩存》，頁25。

57 同註56。

58 譬如〈帝國主義是甚麼？〉、〈自由思想與公開宣傳說〉、〈對地方自治制改革的意見〉、〈台灣的財政自治論〉、〈台灣米的統制問題〉諸文，可參見《陳逢源選集》，頁45-47、57-61、92-110、156、205-211。

賴和來的寬廣硬朗。[59] 然而，即便是如此相對「保守穩健」的書寫風格，他在「新、舊文學論戰」的後期卻投書指出：「真正的詩人，當具有最纖細的神經與最敏感的感情，自然對於一時代一地方的社會事情與民生的痛苦，應有絕好的詩來歌詠出來。」[60] 力主漢詩應以舊形式承載新思維與新現實，應把富有時代性的思想潮流以及人物風土淋漓盡現。亦即陳逢源雖少了些「民間性」的同情與理解，因而與賴和在創作的形式上實踐了不同內容，但陳逢源應該也非賴和小說中所質疑或調侃的那類「不過是被時代的潮流所激盪起來的，不見得有十分覺悟」[61] 的「文化仙」。他在面對殖民強權時一向尚能本著「本島人」的思考位置，再配合世界潮流與台灣統治的特殊性，屢屢對殖民當局提出較中肯可行的建言，直至戰前他已參與文協主辦的講演會不下五十場，[62] 也完成數本重要論述，[63] 當時台人幾乎無人能出其左右，在這個階段確實起到一定的反殖能量，持平而論還不到蔣渭水所指控的「居在資本主義的象牙塔內弄證券割股票過著有閒階級生活」[64] 所謂「御用文人」的程度。

（二）時代課題

陳逢源在日治時期曾以〈對台灣青年之希望〉寄望同好也自我期許，文中他將「有志者」分為保守家、現實家、理想家、經世家四種類型，而以「經世家」的下列特質最被他推崇：

59 我們可以從賴和的家世及行醫風格大致推知其「民間性」、「人民性」特強的背景，不論生活或作品大多與普羅大眾緊密結合。譬如賴和在漢詩〈北港竹枝〉、〈元旦寺廟行香〉、新詩〈七星墜地歌〉裡都能解放自己的身段去思考「迷信」本身所糾結的不同面向和價值。參閱（1）林瑞明，〈賴和與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文學與時代：賴和研究論集》，頁182；（2）陳萬益，〈啟蒙與傾聽——論賴和小說的人民性〉，《台灣文學論說與記憶》（台南：台南縣政府，2010.10），頁144。

60 陳逢源，〈對於台灣舊詩壇投下一巨大的炸彈〉，《南音》1卷2號-3號合刊本（1932.01.17-02.01），頁129。

61 賴和，〈赴會〉，林瑞明編，《賴和全集・小說卷》，頁67。

62 王世慶，〈陳逢源先生訪問記錄〉，黃富三、陳俐甫編，《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頁139。

63 譬如《台灣經濟問題の特質と批判》（台北：臺灣新民報社，1933）、《新台灣經濟論》（台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台灣經濟と農業問題》（台北：萬出版社，1944）等論著。

64 蔣渭水，〈御用學者的妄論〉，《臺灣新民報》364號（1931.05.16），頁5。不過，也誠如游勝冠所指陳的，在陳逢源這樣的新知識分子身上我們完全可以看見殖民現代性裡既壓抑又啟蒙的特徵，尤其是在日治時代其面對殖民主義（colonialism）時按自己階級所採取的所謂「務實」回應、對策與自我定位，都難免陷入新知識分子與日本殖民之間某種「共謀」關係的困境。參閱游勝冠，《殖民主義與文化抗爭：日據時期台灣解殖文學》（台北：群學出版公司，2012.04），頁128-199。

> 常重過去之經驗，察現在之境遇，而樹將來之理想。故不頑守於過去，不偏執於現在，思進步於將來。得一步守一步，終達其理想，故其理想由過去現在自然而生，順事物進化之則。[65]

同時他也意有所指批評「理想家」：「全不顧過去之歷史，現在之過程。唯慕求將來之理想。故謀事多屬空疏，以致失敗。青年時代抱熱情之人，多有此傾向。」[66] 他認為任何特定一時一地的主張或意識，不全然要永恆或普世不可，而是可隨時空而調整。此文正好反映了剛滿三十歲的青年陳逢源面對強權時往後處世應對的心跡。

1926年間，文協成員們為了探索台灣未來的走向而在思想上的分歧愈趨明顯，1月時由陳逢源、蔡培火、蔡年亨三位「治警事件」受刑人所擔任的第七回議會設置運動就在台北餞別會上遭到王萬得等人的質疑，這些無產青年團體認為這種由地主（如林獻堂）和小資產者（如陳逢源）為主力的「叩頭請願行為」，終究會出自個人或階級利益而動搖妥協（「八駿事件」可說坐實了此種說法），不只無效最後也易遭到背叛，不如直接以群眾運動來取代議會運動。結果為了避開殖民當局的壓制，最後大夥繞了個彎以「中國改造問題」的名目出現了主導階級與左右路線的公開論辯。

首揭其端的就是陳逢源閱讀田崎氏《支那改造論》後寫就的〈最近之感想（二）我的中國改造論〉乙文。[67] 大致上，陳逢源比較以「經世家」現實的立場思考處於被殖民地位的民族如何循序獲得獨立或自治性格，與當時站在社會主義立場主張以工農鬥爭尋求民族解放的許乃昌、蔡孝乾等人各自提出辯駁。[68] 雖說長期以來台灣人同處殖民強權的壓制下，時常只是因個人的不同生命情調（或稱之階級位置的差異）而覺醒或不自覺地採取不同的進路，如一生

65 陳逢源，〈對台灣青年之希望〉，《臺灣民報》1號（1923.04.15），頁2。
66 同註65。
67 陳逢源，〈最近之感想（二）我的中國改造論〉，《臺灣民報》120號（1926.08.29），頁8-10。
68 除了上文外，陳逢源尚有後來為答辯許乃昌而寫的〈答許乃昌氏的駁中國改造論〉，《臺灣民報》第130-139號（1926.11.07-1927.01.09）。關於這段「左右論辯」你來我往的詳細過程及分析，可參閱（1）張炎憲，〈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與分裂〉，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4.12），頁286-287；（2）謝國興，《陳逢源：亦儒亦商亦風流（1893-1982）》，頁159-187。

都過著資產階級生活的陳逢源雖兼具同時代知識分子多有的左翼素養及理解左翼思潮所帶來的可能性，可是他仍不完全贊成社會主義的冒進也不照單全收資本主義的掠奪等；但這場「左右論辯」至少凸顯之前由資產階級所主導的社會運動已面臨的困窘及侷限，也預示了1927年以後文協內部為爭奪反殖／解殖領導權而「左」、「右」分裂的一系列開展。[69]

對左翼思潮抱有憧憬的賴和，在他最富暗示性的作品之一的〈前進〉裡，最後預告說：「失了伴侶的他，孤獨地在黑暗中繼續著前進。前進！向著那不知到著處的道上……」[70]，在不違反賴和的書寫脈絡下我們倒是可試著將文中的「他」視為賴和的自擬角色，那麼陳逢源很有可能就是那位「伴侶」之屬。陳、賴兩人自從文協創立以來一直都是運動中的核心伴侶之一，直到1932年由林獻堂、楊肇嘉、陳逢源等人自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時，兩人在反殖／解殖的場域上才漸行漸遠。上述引文，正透露出上個世紀三〇年代新文協與民眾黨因日益左傾而遭解散、部分舊文協另組地方自治聯盟時，賴和當時雖然對未來的社會主義其前景無甚把握，卻在精神上給予肯定的心境。[71] 我們也可以從兩人與林獻堂接觸時前後所呈現的迥異評價，一窺陳逢源在肆應左右分裂時的抉擇心路。

很明顯地賴和對林獻堂的評價前後大不同，大約作於1920年文協草創期的〈送林獻堂先生之東京〉尚且推崇林氏：「愧我戀生甘忍辱，多君先覺獨深憂。破除階級思平等，掙脫強權始自由。欲替同胞謀幸福，也應悟到死方休。」[72] 可是後來，卻在小說〈富戶人的歷史〉中就直指阿罩霧（即霧峰）的林家當年積聚的產業可說是以「掠奪」和「血腥」起家的，「講起來現在也會教人起雞母皮」；[73] 在〈赴會〉裡也安排了一段兩位勞動者十足「揶揄」的對

69 反觀賴和的「切實走向民眾中間」、「人道主義傾向」的特質使得他在處世上具有左右調節的能耐，也因此賴和於文協及民眾黨前後分裂、「左」「右」對立時，出奇地在各個陣營同時被接受或列名要職。參閱陳建忠，〈反殖民戰線的內部批判——再探「賴和與台灣文化協會」〉，《台灣史料研究》19號（2002.06），頁180-185。

70 賴和著，林瑞明編，《賴和全集・新詩散文卷》（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06），頁253。

71 林瑞明，〈賴和與台灣新文學運動〉，《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賴和研究論集》，頁90-91。

72 賴和，《賴和全集・漢詩卷》下，頁326-327。

73 賴和，《賴和全集・小說卷》，頁309-310。

話，[74] 賴和此時不止露骨地挖苦林獻堂這班「雞規先」的文化仙及其運動後期所展露的「妥協性」，也特地讓小說的主人翁「我」在奔赴文協決裂前夕的會議前，說出「要赴目的地須再換乘小火車，我走進小驛裡碰到了一位同志，他是一等客，我買的是三等票，只是幾句寒喧便就分手。」[75] 這段自述，我們大抵可以理解這是賴和的立場與選擇：即在解決台灣人受殖解殖的共同目標上，最後只得各憑財／才力及階級（氣味）來選擇不同的路徑分進合擊。相較於陳逢源，賴和一生「左」的成分多了些，但也同時處處留下摸索、掙扎的痕跡。

毫無疑問的，陳逢源就是「一等客」那類的同志了。如前所述，自「八駿事件」之後陳與林獻堂的關係愈加密切，戰後林獻堂客死東瀛（1956.09.08）時陳逢源以〈哭林灌園〉：「曾隨驥尾唱民權，忽忽滄桑三十年。誰信人琴成永絕，羊曇東望淚潸然」[76] 遙悼，由此可推知亦師亦友、交情匪淺。其餘如「床前喜就梁松拜，一派人間正氣尊」（〈壬戌夏霧峰萊園訪林灌園〉）推崇林獻堂的人品氣節，「春入萊園詩更好，老來梅福品尤高」（〈辛巳春寄懷灌園〉）、「不行蕩蕩平平道，偏向懸崖險處馳」（〈感懷再寄灌園〉）[77] 皆是暗喻林獻堂為民謀福、不畏橫逆的精神。1934年8月，林獻堂發函給全台有志者邀請其參加9月2日在台中召開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相談會」商談運動中止問題，這個會議的原始構想便是出自陳逢源向林氏建議的。同時我們也該注意，當時收到邀函的賴和並未出席，沒出席的原因事後也不見任何紀錄，除了「事忙不克參加」外，當然更有可能是一種態度。[78]

不過，縱使陳逢源的反殖路線與賴和、蔣渭水以至許乃昌等人都不盡相似，但觀諸具體事實，其對左翼的「農民組合」自始至終卻有著相當程度的理解，不但同情也大力支持，經常應邀出席農組的各地大會當個純粹的「傾聽者」，最典型的留影是1928年12月30至31日「農組」第二次全島大會在台中召

74 賴和，〈赴會〉，《賴和全集・小說卷》，頁68-69。
75 同註74，頁67。
76 陳逢源，《溪山煙雨樓詩存》，頁84。
77 以上三首引自《溪山煙雨樓詩存》，頁12、39、40。
78 按林獻堂的日記所記，1934年8月24日他所發出的邀函共24人，其中包括賴和；但在9月2日正式會議當天的日記裡，林獻堂除將預期的「中止」決議詳列之外，亦將出席人員一一記下，名單上不見賴和。參閱林獻堂著，許雪姬編註，《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4.04），頁330、342。

圖四　圖片取自謝國興，《陳逢源：亦儒亦商亦風流（1893-1982）》，頁186-187。

開時，會後所留下的一張「農組」時代很有代表性的紀念照（圖四），裡頭有身著新舊服式的婦女、智識階層，更有憨厚、土味十足的赤腳青年。相片中身著舊式長袍的陳逢源（前排蹲者左數第三位）神態出奇地冷靜，據說常被一些左翼人士友善戲稱為「收租派的社會主義」者。[79] 對陳逢源而言，「左」不止是經濟、階級或性別議題，更意謂著「道德」。

五、歷史訪談的政治失憶

1945年8月15日，台灣人由於日本戰敗而一時掙脫殖民地的命運其喜悅之情是大可理解，陳逢源也旋即在「光復節」（1945.10.25）當天發表了〈台灣光復陳行政長官公洽蒞臨喜賦〉以示雀躍，[80] 不少人事後認為這是「在向國民黨政府交心表態」[81] 的依附投機。可是，如果連「二二八事件」中遇害的林茂生（1887-1947）當時也是用漢詩〈八月十五日以後〉[82] 表達對未來充滿了期

79　王世慶，〈陳逢源先生訪問記錄〉，黃富三、陳俐甫編，《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頁141。

80　陳逢源，《溪山煙雨樓詩存》，頁53。

81　例如藍士博，〈台灣知識分子的形成與轉折——以陳逢源（1893-1982）為例〉，頁83。

82　林茂生，〈八月十五日以後〉，《前鋒》光復紀念號（1945.10.25），後來以〈喜賦〉為題被重新刊載於《臺灣風物》15卷5期（1965.12.31）。轉引自廖振富，《台灣古典文學的時代刻痕：從晚清到二二八》（台北：國立編譯館，2007.07），頁263-264。

待，甚至還刻意獨自改穿中國式的長袍主持歡迎大會，[83] 我們又將如何評議呢？又怎能厚此薄彼呢？從戰前到戰後，確實在身分認同的轉換上陳逢源似乎沒有遇到太大的衝擊，筆者認為此刻從事漢詩創作這件事可能變得非常關鍵。至少漢詩的持續創作，的確有助於陳逢源在政權更替、國民身分改變時，較之其他台灣人在文化心理層面、社群活動中來得較容易「無縫接軌」。

戰後不久，蘇新和陳逸松這兩位曾活躍於日治時期的左翼成員，決定組織「台灣政治經濟研究會」以便深入研討今後社會的變局，陳逢源便是創會會員之一，其餘還有陳炘、王白淵等人。研究會的機關誌《政經報》（1945.10.25-1946.07.25，半月刊共計發行2卷11期）其發行人為陳逸松，主編主要由蘇新擔任，言論傾向左翼色彩，陳逢源不至於事先不知情。如今在11期的《政經報》裡，我們雖然只在第2卷第5期才見到陳逢源正式對談的文章，[84] 但根據陳逸松的回憶，研究會前後曾分別針對台灣最根本的問題召開過四次座談會，「分別以糧食問題、金融問題和物價問題為主題，第四次只有我與陳逢源的對談〈解剖物價問題〉。」[85] 言下之意，可能是指當初參與座談會的創會會員們最後只剩陳逢源堅持到底而已。就以〈解剖物價問題〉裡的觀點而言，陳逢源認為：「全體看來，臺灣已變做國內的外國」了，完全成了殖民地的經濟體，「省公署自己老實說是沒有根本的辦法的」，一時所祭出的取締都只是治標而已；他直言「物價問題，其實就是政治問題」，只有當國共問題解決時才有辦法。[86] 陳逢源除了完全不改務實週詳的風格而就事論理外，比起許多人來也敢勇於承擔言責。[87] 根據他自己的說法，就在這段時間他曾先後推辭了台北市財政局長、糧食局長、省建設廳長的出仕機會而選擇有始有終地參與在野陣營，[88] 這個現象除了印證前述的「收租派的社會主義」特質外，也可說明至少戰後初期的陳逢源尚未「搖身一變」、「精神傾斜」地成為所謂黨國政經結構

83 李筱峰，《林茂生・陳炘和他們的時代》（台北：玉山社，1996.10），頁137。
84 陳逢源、陳逸松對談，〈解剖物價問題〉（日時四月二十七日夜地點政經報本社樓上），《政經報》2卷5期（1946.05.10），頁6-7。
85 曾健民撰述，《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放膽兩岸波濤路》（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11），頁76-77。
86 同註84，頁7。
87 前面的三場座談會內容，因為不少參與的人要求匿名，故全文都採不具名發言與記錄。
88 王世慶，〈陳逢源先生訪問記錄〉，黃富三、陳俐甫編，《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頁161、162。

的一環。

不久後爆發了「二二八事件」，陳逢源於第一時間寫下了〈二月二十八日事變有感〉：

> 江城昨夜起狂波，後果前因究幾多；人事難分棋黑白，黨碑長灑淚滂沱。
>
> 已知老驥雄心死，其奈哀鴻滿眼何；稍喜劫餘身尚健，一春花信付蹉跎。[89]

此處他雖對死難者表達哀悼之意，也說自己劫後餘生餘悸猶存，可是已老於世故的陳逢源仍不免語多保留地發出「後果前因究幾多」、「人事難分棋黑白」之慨，並沒有只想一味譴責官方的失政殘忍，其書寫視角於無力無奈之餘為這樁傷痛的歷史留下不同的調性。

經過事件洗禮後陳逢源雖說心有餘悸，可是往財經界一展長才的抱負並未因而改變，還順勢「抓住機會」在4月1日以華南銀行「常務董事」（相當於副董事長）的身分再兼任「台灣信託公司籌備處」的主任委員（這個職務原是陳炘所擔任）。後來陳逢源又基於「經營策略」的考量，審時度勢地「協助」官股當家的華南銀行合併本土色彩較濃的「台灣信託公司」，使華銀得與當時的彰化銀行（董事長林獻堂）、第一銀行（董事長黃朝琴）鼎足而立。[90] 當「二二八」滿一週年時陳逢源有感而發，以一首〈殘春弔林耕南〉紀念事件中死難的摯友林茂生，誠如詩末所自註的「二月廿八日事變中不知死所」，詩作最後兩句「又是一年春盡日，墓門何處弔先生」[91] 看似輕描淡寫，卻十足道盡故人遇害的無盡悲涼。可是就在這段動盪不安的時期，社會上傳言陳逢源趁事件之際「構陷」了力阻合併案最力的陳炘，難怪乎學者廖振富也曾針對上述詩

89 陳逢源，《溪山煙雨樓詩存》，頁54。

90 關於「台灣信託公司」併入華南銀行乙案，合併詳情可參閱（1）謝國興，《陳逢源：亦儒亦商亦風流（1893-1982）》，頁262-280；（2）李筱峰，《林茂生・陳炘和他們的時代》，頁294-305。

91 陳逢源，《溪山煙雨樓詩存》，頁56。值得一提的是，陳逢源與林茂生於日治時代即為故交，「治警事件」時人在獄中的陳逢源便曾以一首七律〈寄林耕南〉寄贈林茂生，彼此相互砥礪（見《溪山煙雨樓詩存》，頁15）。

作評論說：「比較耐人尋味的是，陳逢源與陳炘的關係更為深厚，卻不見他有追弔陳炘之詩作，背後隱藏著複雜的人事糾葛與難言之隱」吧？[92] 多少道出不少人內心的疑慮。不過，筆者認為當年的合併案早就是長官公署預謀掠奪的「囊中物」，並非僅憑陳逢源便能恣意定奪或一手遮天，「雙陳」倆人在時勢所趨下充其量就是經營理念不合的「瑜亮心結」罷了，在黨國霸權的結構下真正有能耐移走陳炘這塊擋路的大石頭的，很明顯應該就是當時擁有權力決定是否要「選派」陳逢源去執行合併任務的那個人／集團。[93]

相較於一開始的欣喜，戰後頭幾年整個社會轉趨殘敗陳逢源心裡非常清楚，當他1948年偕同劉啟光同去花蓮港考察時面對「百業蕭條剩劫灰」的情景，[94] 不免時而興起「書生挾冊終何濟，真遜東陵學種瓜」這樣的遁世念頭。[95] 不料到了1949年開春後，國民政府接連在中國境內的國共內戰中節節敗退，早已致力金融營生的陳逢源陸續寫下了「時局面臨將劇變，且舒淚眼待平夷」、[96]「過江名士共登高，隔水頻傳血戰豪（金門大捷）」[97] 的詩句，顯然他並不希望此刻統治台灣的政權就此覆亡。

1951年10月，陳逢源以新科台北市議員的身分競選第一屆（臨時）省議員（按：係由各縣市議員互選的間接選舉），這是當時台灣地區等級最高的民意代表，結果以最高票數當選（按：台北市有四席）。選後來自各界的賀喜不斷，其中有兩則刊載在《公論報》的「訊息」最引發筆者的興趣：第一則是來自於「台北區合會儲蓄股份有限公司」（按：以下簡稱「北合會」）全體董

92 廖振富，《台灣古典文學的時代刻痕：從晚清到二二八》，頁302。

93 陳逢源為了讓日治時代早已官民合資的「台灣信託公司」併入官方的「華南銀行」而與半山劉啟光（原名侯朝宗，時任華銀董事長）聯手「害死」陳炘的說法一直在社會流傳。眾說紛紜中最典型的指控可以巫永福的記載為代表。（見巫永福，《我的風霜歲月：巫永福回憶錄》，台北：望春風文化事業公司，2003.09，頁187）但面對傳言的陳逢源，在訪談時重提「合併案」不但不避諱，還自信地說：「台灣信託公司合併於華南銀行則全為我的力量」，以如此安排可以促進工商業繁榮而引以為豪。只能持平說，對於陳炘突如其來的遇害，在那樣的時空下陳逢源除了清者自清外，實在也愛莫能助。（引自：王世慶，〈陳逢源先生訪問紀錄〉，黃富三、陳俐甫編，《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頁163）

94 陳逢源，〈同劉明遠（啟光）考察花蓮港〉，《溪山煙雨樓詩存》，頁55-56。

95 陳逢源，〈一枕〉，《公論報》，1948.12.12，6版。按：凡直接引述《公論報》之詩作，皆為《溪山煙雨樓詩存》未收錄者，以下同。

96 陳逢源，〈時局感言〉，《公論報》，1949.01.19，6版。

97 陳逢源，〈重九日草山溪山煙雨樓雅集〉，《公論報》，1949.11.09，6版。

監事暨職員的慶賀啟事（見圖五），第二則是每位當選的議員的背景簡介（見圖六），透過它們我們獲悉陳逢源這時在金融事業上又更上一層樓，但更重要的是——雖說有點「意外」——得知他事實上已入籍為國民黨員了。換句話說，此刻的陳逢源無論是在國族認同或意識形態上比起之前都做出了更明確的「抉擇」，也正一步一步地更加融入黨國政經體制。

圖五　〈慶祝啟事〉，《公論報》，1951.11.21，1版。

在稍早競選的前夕，陳逢源曾感慨：「書生自古無奇策，空抱殘篇夢大同」，[98] 或許就是不願理想淪為空談，才決定投身政壇。後來接連當選台北市議員及省議員時，他憶及日治時代自己「萬言書上一無成，大筆曾留諤諤名」，[99] 雖然著作等身卻一事無成，如今「奪得錦標知任重，喜從民主放光明」[100] 可謂一時躊躇滿志、頗想一顯身手。不久省議

圖六　〈臨時省議員介紹〉，《公論報》，1951.11.19，1版。

98　陳逢源，〈初秋感興〉，《溪山煙雨樓詩存》，頁68。
99　陳逢源，〈當選省議員感作〉，《溪山煙雨樓詩存》，頁68。
100　同註99。

會開議（1951.12），陳逢源自言一路走來「為護民權不厭爭，蹉跎歲月愧無成……而今中道無人問，莫笑常談是老生」，[101] 今後仍能不忘日治以來為爭「民權」而奮力不懈的初衷。大約就在第一屆第二次大會結束之際（1952.06-09），陳逢源題贈《公論報》創辦人也是省議會同仁李萬居一首七律，寫說：

> 半住林泉洗俗埃，北山何必賦歸來。公車漫上匡時策，草澤仍登大將台。
>
> 花艷佛桑三夏過，風吹仙桂一枝開。近知世態多翻覆，豎子縱橫亦可哀。[102]

這首七律後來收錄於《溪山煙雨樓詩存》時，不但名稱有所異動，內容也多處修改，特別是末聯已改寫成「多君舌本懸河處，但覺奔濤滾滾來」。[103] 整首漢詩大抵可看成陳逢源除了為彼此打氣之外，也是褒譽李萬居問政不遺餘力、不畏權勢，在議會上可謂一枝獨秀。

1954年4月，陳逢源再度競選第二屆省議員（已改為普選），有詩云：「爭名原自乖初志，笑向漁郎更問津」，[104] 表明自己一切以豁達自處，並非為了名利而選舉。可是，在這屆任期內陳逢源似乎有愈來愈使不上力的沮喪，隔年（1955）新春更深覺「議郎舌在知何用，未答涓埃愧選賢」。[105] 然而相較於自己的無力感，議會裡的同人李萬居卻大有愈挫愈勇的趨勢，當他二度題詩贈與李萬居時，便說：

> 海峽烽傳月幾更，將軍細柳佈新營。江東子弟貔貅壯，舌底風雷魍魅驚。
>
> 擊缺漫歌曹樂府，抱殘猶有魯書生。頻年觴詠端陽盛，他日憑論頌太

101 陳逢源，〈首屆省議會散後歸宿陽明山〉，《溪山煙雨樓詩存》，頁69。
102 陳逢源，〈近感於事賦呈李萬居先生郢政〉，《公論報》，1952.09.19，6版。
103 陳逢源，〈省議會紛爭無已歸息山莊贈李萬居同人〉，《溪山煙雨樓詩存》，頁69-70。
104 陳逢源，〈甲午春再競選省議員有感〉，《溪山煙雨樓詩存》，頁77。
105 陳逢源，〈乙未新春感作〉，《溪山煙雨樓詩存》，頁78。

平。[106]

陳逢源自是讚嘆李萬居問政時其草莽風格的背後有其寧為公義而直言不諱的脾性，結果他對李萬居的封號「魯書生」後來竟不脛而走。[107] 在省議會眾多同仁中，陳逢源寫的漢詩只贈與過李萬居一人，可見兩人這段期間交情匪淺。總計陳逢源第一、二屆省議員的任期約共五年半，根據〈附錄：陳公逢源在台灣省臨時省議會之質詢及提案簡錄〉所載，約有對財金政策、台幣發行、外匯貿易、開放公營事業……等以金融財經為主的議題，完全延續了日治時期其沉穩不空洞、可行且「合法」的建言風格，唯一較例外的就是少了從前還會對實質的政治現象進行檢討的言論；[108] 某種程度，這些議題應該都早已事先經過陳逢源自個心裡的「小警總」自我篩選過的內容，對當局實際上無毒無害，也確實完全不具挑戰及威脅，若說陳逢源此刻事實上是被黨內「過濾」過的一股清流，同時無意中也成為社會上一片有助於政權穩固的「安全閥」，一點都不為過。此外，他也常與李萬居等人就自己的專長或關心的議題聯手提案。[109] 不過，從上述〈附錄〉裡的記載，我們可觀察到愈到第二任的後半段愈出現異於以往的欲振乏力現象，甚至到了省議會「第二屆第六次大會」（即第二屆的最後一次會期，1956.12-1957.03）召開時，一整個開議會期下來——更精確來說，應是直至任期結束（1956.12-1957.06）——陳逢源不但沒「提案」、連「質詢」也付諸闕如，非常例外地完全沒有任何作為。[110] 可是，反觀李萬居卻自上個會期（第二屆第五次大會，1956.06-1956.09）開始，不管是議場裡或議場外其發言與行動都明顯地日趨激烈。

106 陳逢源，〈詠近事似李萬居先生〉，《公論報》，1955.07.17，6版。這首七律後來收錄於《溪山煙雨樓詩存》時，名稱更動為〈詠近事似李萬居同人〉（頁79）。

107 後來很多人在稱頌李萬居時，多喜在文中或標題上使用「魯書生」或「魯莽書生」乙詞，例如（1）謝德錫，〈辦報論政的「魯莽書生」李萬居〉，《民眾日報》，1987.11.18，11版；（2）楊錦麟，《李萬居評傳》（台北：人間出版社，1993.11），頁214。

108 該〈附錄〉收錄於《陳逢源先生紀念集》，頁403-419。

109 陳逢源與李萬居等人聯手建請的「提案」計有四件，亦都財經性質，同樣地絕不碰政治議題，其「按由」及「實質內容」可參閱台灣省諮議會編著，《台灣省參議會、臨時省議會暨省議會時期史料彙編計畫：李萬居先生史料彙編》（台中：台灣省諮議會，2001.12），頁72-73、74-76、83-84、86-87。

110 參閱〈陳公逢源在臺灣省臨時省議會之質詢及提案簡錄〉，《陳逢源先生紀念集》，頁403-419。

在「第二屆第五次大會」上，李萬居一口氣接連提交了好幾項儼然已脫離一般時政的敏感「提案」，諸如「請政府轉請中央當局寬赦政治犯用德治而啟新生之路案」、「請政府注意一人候選局面造成之原因並設法予以改善案」、「請政府轉請中央依照憲法規定准許人民有組黨自由案」……，一案比一案更直接挑戰黨國體制的威權結構，結果事後當局竟都只以「並無所謂政治犯」、「訂有『妨害選舉取締辦法』」、「政府並無限制人民組織政黨事實」等語四兩撥千斤地實問虛答。[111] 緊跟著在接下來的「第二屆第六次大會」上，除了尖銳地延續上回大會的提案主題外，李萬居再接再厲對當時省主席嚴家淦又是一連串砲火強大的「質詢」，逼得嚴家淦都僅能事後以書面含糊答覆。[112] 就在這段期間，議場外的李萬居也與雷震以及以《自由中國》為代表的來台智識分子們頻頻接觸，彼此在籌組「中國民主黨」的議題上相互奧援。

相對於李萬居愈發鮮明的「反對者」角色，此刻日漸成為國府財經「樑柱」的陳逢源，卻早已自願性馴服在黨國資本下「換取」了不少個人政經資本的發展，此刻的他除了是華南銀行與北合會的核心決策人物之外，還陸續增兼三十餘家實業公司的董事長或董事，這些企業雖有部分是民營機關，但董監事會的結構其背後事實上與官方或黨國權貴卻多有千絲萬縷的「恩侍 ── 依存」關係，其中黨國資本的挹注更是沒少過。[113] 如果陳逢源憶及日治時代四處演講時，「講的題目都是反對獨裁」，[114] 那麼如今反倒在擁有如此眾多的政商名器時卻棄之不用，恐怕多少會對自己異常的「沉默」感到不安。

1956年時，雷震、李萬居等人籌組新黨的呼聲早已燎起星星之火，《自由中國》雜誌社就刻意選在1957年6月舉行的第三屆地方選舉（包括縣市長、省議員選舉）的前夕（1957.04.01）趁勢刊出極為震撼的〈反對黨！反對黨！反對黨！〉[115] 乙文，極力鼓舞人民起來籌組反對黨而不要畏懼國府的違憲打

111 以上「提案」及「審查意見」，參見《台灣省參議會、臨時省議會暨省議會時期史料彙編計畫：李萬居先生史料彙編》，頁91-96。

112 以上「質詢」及「答覆」，參見《台灣省參議會、臨時省議會暨省議會時期史料彙編計畫：李萬居先生史料彙編》，頁171-175。

113 這些實業公司的詳細名號，可參閱謝國興，《陳逢源：亦儒亦商亦風流（1893-1982）》，頁281-293。

114 王世慶，〈陳逢源先生訪問記錄〉，黃富三、陳俐甫編，《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頁146。

115 朱伴耘，〈反對黨！反對黨！反對黨！〉，《自由中國》16卷7期（1957.04），頁222-224。

壓，這個時間點不但是「二二八事件」滿十周年的敏感時刻，恰好也是第三屆（臨時）省議員開始登記參選的日子。[116] 正當國民黨要再提名陳逢源續選第三屆省議員時，出乎意料地陳逢源婉辭了。按理說，這個階段的陳逢源可謂政商兩棲、左右逢源，千載難逢之餘「最有可能」也「最有機會」實踐自「治警事件」以來所懷抱的「理想」，何以需要「急流勇退」不再競選？在後來的歷史「訪談」中他回應說：

> 後來財政、金融、貿易之權限都歸中央，在省議會無法過問，只說亦無效，因此余仍未繼續競選連任。假如有意見仍可在新聞發表，不必到議會去講。[117]

其中當然不無實情（譬如藉此巧妙暗示省議會只是形同虛設、敷衍民意的機關而已？），可是我們如果注意到自此以後陳逢源幾乎完全不涉政治更遑論投書的事實，便知上述說辭顯然言不由衷。證據之一，便是遠離政壇的隔年（1958），陳逢源就有一首寫給「紅粉知己」麗卿的贈詩〈辭競選省議員業經年餘賦此示麗卿〉，他先是有點自我調侃地說：「讓開賢路一年強，居勝人疑冒辟疆」[118] 慶幸自己因辭選，才有機會過上目前這種才子佳人的風流生活，不過，結尾時終究還是吐露了「歷盡滄桑看棋局，世間滋味我深嘗」數語，[119] 略為交代「讓賢」的真正心境。在訪談中，陳逢源曾提及生平第八次（1957）之所以刻意躲至日本遊歷，最主要的就是去「避選舉之漩渦」[120]，雖然語意不甚清楚，但可想而知當時國內的「政治場」其背後所潛藏的凶險迫使深嘗世味、觀棋無數的他也不得不臨陣退縮。陳逢源之所以放棄「為民喉舌」這項曾經主動爭取而來的機會、如今卻一步步退怯離場的真正緣由或背景，至少有兩個現象值得推敲。

---

116 登記參選日從3月下旬起至4月上旬，參閱〈台灣省議會大事記〉，「台灣省諮議會」官網（來源：http://www.tpa.gov.tw/opencms/digital/area/chronicle，2017.01.18）。

117 王世慶，〈陳逢源先生訪問記錄〉，黃富三、陳俐甫編，《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頁164-165。

118 陳逢源，《溪山煙雨樓詩存》，頁92。

119 同註118。

120 王世慶，〈陳逢源先生訪問記錄〉，黃富三、陳俐甫編，《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頁121。

首先是，陳逢源深刻體認到戰前在報章批判殖民政策時，雖說需事先通過審核，有時部分字句還會被塗黑挖空，可是一旦核准刊登，當事人便無需擔心秋後算帳或險遭不測，在嚴酷的殖民政權下雖說打了折扣，至少還受到一定的法律保障，即便是當年的「治警事件」頂多也是有期徒刑的關押，如陳翠蓮所說的：「日本殖民當局就算再暴戾，仍遵守法治原則進行審判」；[121] 但從「二二八事件」以來，眼前這個政權幾乎沒有現代法治概念，處在黨國體制下因言賈禍而「家破人亡」的案例觸目皆是，這種完全讓人無法明白政權是如何運作、無法預測的恐懼、連起碼的「依法行事」都奢想的環境卻是日治時期所罕見。

其次是，刻在發生的李萬居其人其事所引發的「衝擊效應」也是相當關鍵的因素。陳逢源與李萬居除了同為議會同仁與「詩友」外，[122] 先前又有緊密而合作的問政關係，可是近一、二年李萬居等人積極推動「組黨」，一向對政經走向嗅覺極為敏銳的陳逢源應早已警覺到李萬居已成國府亟欲拔除的眼中釘，不僅政治抗爭只會愈演愈烈而且議場生態也即將丕變，身為黨員的他既無能奧援又深覺此舉無異螳臂擋車，接下來的整肅行動遲早是要禍延開來。就是在長期糾結的顧慮中，陳逢源「別無選擇」當機立斷遠離政治場，同時其漢詩再也未刊登於《公論報》，陳、李二人從此走向截然不同的命運。[123] 尤有甚者，當李萬居於1966年過世時，舉凡來自黨、政、軍、民各界上千條的誄詞、輓詞、輓聯、輓詩中，有違常理地竟獨缺陳逢源的憑弔。[124] 然而，也正可能因「適時」告別政壇，以及與李萬居進行一定程度的「切割」，陳逢源方可躲過日後緊接而來的政治風暴而繼續在金融界求得發展。

121 陳翠蓮，《百年追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卷一自治的美夢》（新北：衛城出版，2013.10），頁112。

122 在李萬居的著作或有關他的出版品、研究評論裡，極少保存或引用李氏的漢詩，筆者目前尚無找到其與陳逢源往返酬唱的作品。

123 陳逢源自此完全退出政壇、不問政事的心境，我們也可以從他在《溪山煙雨樓詩存》裡自這年（1957）起，便將後續的創作分別依序命名為「東游集」、「晚晴集」、「養生集」三個單元的舉動，便可知其「心境」於一二。

124 當時所有的悼詞均被收錄於楊瑞先（曼池），《珠沉滄海——李萬居先生傳》（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04），頁159-222。按：在《溪山煙雨樓詩存》中收有不少陳逢源歷年來所寫的「輓詩」，若憑陳、李二人先前的政商詩情，在李萬居過世之時卻獨缺對其憑弔之作，確實非常違反常理。

隨著1957年6月李萬居、郭雨新、吳三連、郭國基、李源棧、許世賢等人（所謂「五虎一鳳」）陸續高票當選第三屆（臨時）省議員後，議會自第一次大會（1957.06-1957.09）開議便砲聲隆隆。正因國家機器選前選後的違法亂紀不可勝數、已到忍無可忍地步，李萬居、雷震等人發起「在野黨及無黨派候選人座談會」，開始四處商討要以組黨的形式突破當前黨國專擅的困境。就以李萬居獨資經營的《公論報》來說，便接連在報版上鼓吹組織反對黨，明確拋棄以往對國府冀存的改革幻想，也因此招惹往後一波又一波愈加殘酷的整肅，終致「報毀人亡」，可說1957年前後的組黨運動不論是議場內、外都處處暗潮洶湧。[125]

對照於先前一度熱絡的詩情，我們卻在1966年李萬居備極哀榮的靈堂上竟看不到來自陳逢源的隻字片語，就可猜見當年李萬居／《公論報》等組黨運動所引發的後續「效應」對陳逢源所造成的衝擊極為深遠，陳的退出政壇其中曲折雖難以盡悉，但很大的成分應是受挫於此，即使已事過境遷將近十年了仍「有所忌諱」，沉默之後的陳逢源成了十足的「驚弓之鳥」。然而為了保住一展長才的機會（當然也可視為保住隨之而來的榮華富貴）而明哲保身，然後逐漸自我閹割噤聲、精神傾斜的陳逢源，除了在1962年出版《詩存》時決定大動作更改「不合時宜」的字句以求取「政治正確」外，更在李萬居過世的隔年接受了王世慶的「歷史訪談」，最單純的理由當然是為了「不使青史盡成灰」。在這篇訪談內容裡，陳逢源呈現出「實」與「虛」兩個層面，「實」是坦誠交代自己一向較具「妥協性」、「講究切實」、「著重實際」、不作「無謂之犧牲」只因為「不值得」……等處世原則；[126]「虛」則是透過「實」的特質再以矯情的修辭來滿足眼前政權一時的虛榮。就陳逢源逐條回應提問時，筆者疑其刻意扭曲自身記憶及歷史脈絡以便迎合國府革命史觀、中華道統的內容，以

125 從這段期間開始，《公論報》及李萬居周邊很多相關人員被約談、被抓，終致報社無以為繼（1961）而李氏也鬱鬱以終（1966）。可參閱（1）陳明成，〈側論早期的「李萬居／《公論報》現象」——以戰後三次的「藝文」刊評及其歷史脈絡（1945-1957）為考察對象〉，《台灣文學研究學報》23期（2016.10），頁245-246；（2）蘇瑞鏘，〈「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之研究〉（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頁49-50。

126 王世慶，〈陳逢源先生訪問記錄〉，黃富三、陳俐甫編，《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頁147、149、159。

下特舉其熒熒大端者：[127]

	回應內容（出處頁數）
1	自述「到過大陸三次」，第一次（1922）是「軍閥時代」，對於祖國「感覺沒有什麼希望」。第二次（1934）去考察華南，「是在北伐以後國民政府積極在建國時期，所以感覺很有希望」。第三次（1938）是日本侵占南京後，認為「日本侵華之野望難於實現，對國民政府之領導抗戰加以大期待」（頁118-119）。
2	認為日治時代由於詩社人才輩出，「因此才保住了中國文化在台灣於不墮」（頁135）。至於詩社林立的現象，「這是日據時期台胞對民族的懷念，傳統上欲學作詩」（頁173-174）。
3	認為文協「表面上是講提倡發揚文化，其實是從事宣揚中國文化及民主運動」（頁138）。
4	自述「邇近有人攻擊我擁護日本大東亞共榮圈主義」，但實則「我之真意則都以詩表示反對」，其中主要原因是「舊詩比較深，一般日人看不懂，所以作詩代表言論則比較不會發生事故」（頁145）。
5	自述「中日戰爭發生後，台胞心內都希望日本戰敗，我到大陸旅行考察時，也感覺日本一定失敗，這可引詩佐證……」（頁146）。
6	自述「台胞之政治運動，確有受中國國民黨之影響……可以說一脈相通」（頁149）。
7	自述在日治時代便與國民黨籍的半山人物如翁俊明、謝東閔、劉啟光等交好，意在暗示自己彼時已是「秘密」黨員了。（頁149）
8	認為日治時期從事文化、政治運動之「諸同志均以演講或撰文刊登報紙宣揚中國文化，不然則我中國文化會被在台日人之愚民政策，皇民化運動下消滅」（頁160），結果「台灣在日據時期，我國文化不但未被消滅，而且得發揚光大」（頁160）。

在與歷史「記憶」及政治「遺忘」的爭鬥上，陳逢源顯然參與了神話的打造，並與當權者站在一起，導致他部分的「口述」最後如同其他黨國體制下所製造的歷史霧霾，長期以來也加入了「官方謊言的共謀」。但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整個訪談過程中，陳逢源從頭至尾都很在乎自己過往的家國立場，如遇有對其過往「忠誠度」的疑慮時，[128] 他就會先表明自己向來習慣以「詩」明志，強調整本的《詩存》即為他「個人歷史之記錄」，[129] 進而可作為他強力表態的佐證。可是，就如先前藍士博檢驗的成果——發現陳逢源日治時期多首舊作是以日本國民立場書寫，後來於1962年正式出版《詩存》時曾加以

127 表格裡的引文皆引自〈陳逢源先生訪問記錄〉乙文。
128 王世慶，〈陳逢源先生訪問記錄〉，黃富三、陳俐甫編，《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頁136、145。
129 同註128。

更刪[130]——更刪之舉「適得其反」地坐實了自己「身世」與「家國」的搖擺性。早已擠身社會名流，甚至是被視為承繼「抗日」傳統的仕紳代表，陳逢源面對「受訪」乙事難道沒有更好的選擇？雖說有可能當初是為了求取更大張的「政治保單」？抑或他此刻連保持沉默都已顯得身不由己了？無論出自哪一種動機，強權暴力迫使人民言不由衷地依違於政體，從而編纂歷史以致訪談裡充斥著不少遭到扭曲的內容，陳逢源的「忠誠度」恰好彰顯出黨國體制邪惡的本質。

六、以《台灣歷史人物小傳》缺漏陳逢源為憾

如果觀察陳逢源自從接受公學校的同學王受祿之邀參加「同化會」、故國歸遊時蔣渭水邀之加入文協，直至後來身為「台灣民眾黨」、「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成員或主導華南銀行合併案，我們便會從中發覺其自處之道一向是「順性」也懂得「順勢」抓住機會。陳逢源有理想、想做一番事業，處世應對較權宜、妥協性夠，具有許乃昌等人所批評的資產階級特有的「動搖性」，如果以陳逢源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他自承的「務實」性格。若進一步從整體的「生命傳記背景」[131]來探究，陳逢源從日治時期起便習於跟從林獻堂等人在「政治機會結構」與「大環境」的考量下，以「西方 ── 日本」文明為參照來批判殖民差別及主張在既有體制內的漸進改革，有時為了能實際多做些事、多爭取些機會也就不惜某種程度調整初衷而不完全排斥被權力「收編」，在他的作品及身上便較少見到如賴和甚至是李萬居那股「拼氣」，也不像蔣渭水那般引領風騷；總是儘可能避開一個將導致自己坐困愁城甚至全盤皆輸的厄運。大抵陳逢源相信有實踐機會的信仰才是真理，所以當「理想與現實」、「理論與實務」無法完全兼顧時，他應屬於那類會識時務漸漸「傾斜」於現實及實務的人。

130 藍士博，〈台灣知識分子的形成與轉折——以陳逢源（1893-1982）為例〉，《台灣史學雜誌》15期，頁86-87。

131 「生命傳記背景」（biographical background），一種近似先擴展再精縮的人生比例尺，指的是一個人生命經驗中許多實質上影響了個人的重要質素，譬如家世、教育背景、族群、性別、階級，或者先前的政治史、活動史等，這些重要質素共同形塑出他的生命型態及對事物的觀看視角，如此錯綜的生命經驗會使得人們選擇其所偏好的獻身模式。「生命傳記背景」會影響「參與者」對運動的組織、議題與行動策略的選擇；但另一方面，這些運動的組織、議題與戰術的現實發展也是會隨著時間而反過來歷時影響運動者「生命傳記背景」的形塑。參考范雲，〈政治轉型過程中的婦女運動：以運動者及其生命傳記背景為核心的分析取向〉，《台灣社會學》5期（2003.06），頁133-194。

對陳逢源而言，人生未必是「是非題」而可以是「選擇題」，甚至是「複選題」，他的高明與侷限或許盡在於此。

從戰前到戰後，陳逢源在文化遺民或戰地中國、日本內地或台灣本島之間流轉的變項大多取決於政權的遞嬗，否則他就不會在「治警事件」的法庭上對著法官陳述「我們皆愛日本……我們的愛國心敢信不輸台灣當局」[132] 希望總督府能打消一切種族的偏見。對他而言恐怕當下「政治壓迫」的痛切感大過於「國族認同」的急迫性，一定的程度他就是一位亦步亦趨、慣於被時勢所左右的「認同待機者」；等到了上世紀七〇年代初期時，由於政治氛圍開始有鬆綁的跡象，當時「黨外」運動健將康寧祥、黃信介便常去向陳逢源請益日治以降台灣政治運動的經緯，陳逢源終於也能適時跨越那條長期自我禁錮的無形「紅線」而不吝指點，只是最後總不忘交待他們從事改革時，「要力拼，但也要量力而為」，[133] 至少在從事社會改革的初衷上，陳逢源一路走來其內在精神可說都是暗合一致的。

不過，陳逢源和李萬居兩人在戰後不久其實都妄想一個冷血、毫無反省能力的政權來推行民主自由的政體，這不能不是他們理智上共同的一種怯懦的推斷，陳、李彼此之間最大的差別在於兩人雖然都冀望當局能接納他們在既有的黨國框架中發揮長才，然而當「政治機會結構」時不我予時，陳逢源當機立斷「務實地」選擇退場，進而寄情實業，而李萬居卻執意繼續捲入進退維谷的政治漩渦。李萬居的政壇沉浮錄正是陳逢源的即時心鏡，1957年正是兩人消長的交叉點。

當初陳逢源決意加入一個威權體制下眾所皆知的執政黨時，事實上或多或少都意謂著精神層面的退卻，我們也開始會懷疑他的所有「初衷」和「熱情」不被黨國的政經結構所困縛、銷溶以致噤口、共構？而事實證明，陳逢源戰後一再地政治性增刪漢詩舊作、選擇丟棄了自己「對抗／逃避」的最佳「戰鬥位置」，然後也在「訪談」中不大意外地「歪曲」了不少史實；因此，陳逢源之

132 陳逢源，〈陳逢源氏的供述〉，《台灣民報》2卷16號（1924.09.01），頁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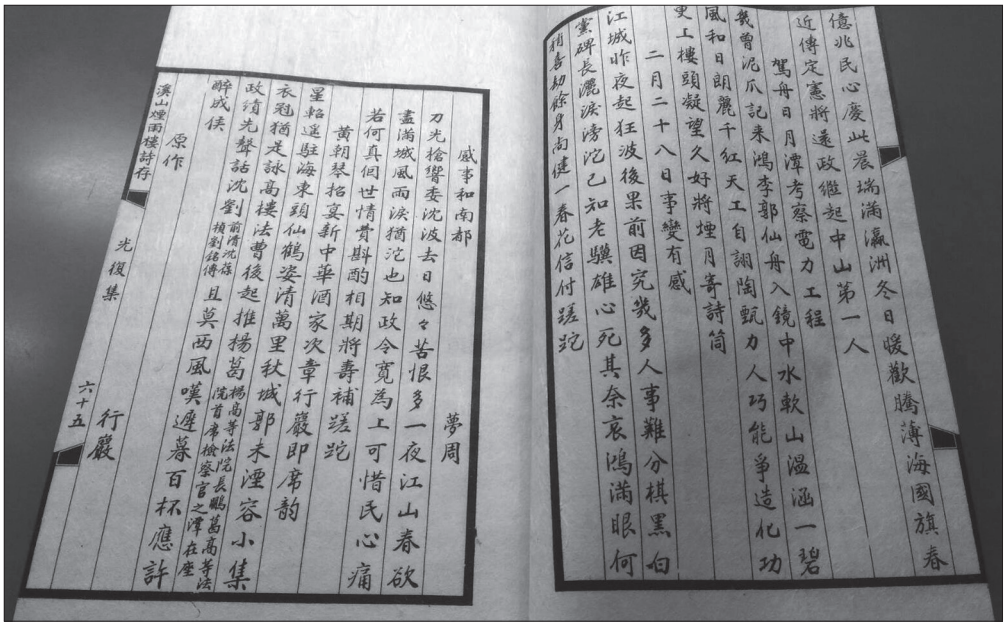
133 見〈康寧祥先生訪問記錄（1998.03.26）〉（黃進興訪問），轉引自謝國興，《陳逢源：亦儒亦商亦風流（1893-1982）》，頁313-314。

所以後來能鴻圖大展，除了他本身積聚的才學外，在戒嚴時空下難道沒有與成為「忠貞黨員」有對價關係嗎？藍士博說他戰後的許多失格舉措都是為換得「國民」身分的代價，固然沒錯，但更精確地說就是為了保住「國民黨」黨員的資格，成為附／屈從的得利者。

特別是本土派的人士普遍視陳逢源為從日治到國府政權變遷下國族認同大「轉向」的代表人物之一，這種普遍「負面」的標籤當然不會全然無辜的。可是當陳逢源面對人性的軟弱時，他同一般人一樣具備功成名就的渴望，特別是在強權暴力與生平志業的交鋒中多少有過趨吉避凶的糾結，卸任省議員的陳逢源某種程度在黨國資本的挹注與恩侍關係的收編下全力轉戰金融實業，可謂如魚得水、卓然有成，持平來說對台灣的經濟與穩定確實有過高度的貢獻，但他同時也「何其幸運」地成為黨國體制下財經領域的標竿及樣版人物。他曾在〈最近之感想（二）我的中國改造論〉中堅持主張當時的中國只有先發達資本主義的基礎才有可能進行改造工程，或許此刻正是他實踐前述「經世家」的「思進步於將來。得一步守一步」的理想。對於一生從未放棄過「合法」改良主義路線的陳逢源而言，這樣的成果可說是他一生最佳的本土實踐了。

至此陳逢源似乎是贏了個人事業，卻輸了歷史定位？這位文協時代的「文化仙」，真只是位「『御都合主義』（即機會主義）的社會運動家」嗎？[134] 這頭銜是陳逢源於1931年在論辯是否需要組織新政黨時，他譏諷蔣渭水從孫文主義（即合法改良主義）的信徒竟轉而響應「共產國際『資本主義第三期』理論」（即激進的階級鬥爭）時贈予對方戴的一頂「大帽子」，如今回首起來總顯得有些令人尷尬。可是，如果真要說陳逢源全無文人的「風骨」，似乎又言重了，因為同樣是那本1962年出版的《詩存》，卻同時也刊登了〈二月二十八日事變有感〉、〈殘春弔林耕南〉兩首真情流露的詩作（圖七、圖八），[135] 試想在那個年代又有幾人敢於明目張膽提及有關「二二八」的作品呢？陳逢源作為一位歷史人物，既有詩人容易傷感的本質又有商人務實的思維，要說此刻是「歷史際遇」左右了他？還是他竄改了

134 陳逢源，〈討究渭水君的理論的重大矛盾〉，《台灣新民報》358號（1931.04.04），頁5。
135 陳逢源，《溪山煙雨樓詩存》（台北：出版者不詳，1962），頁64、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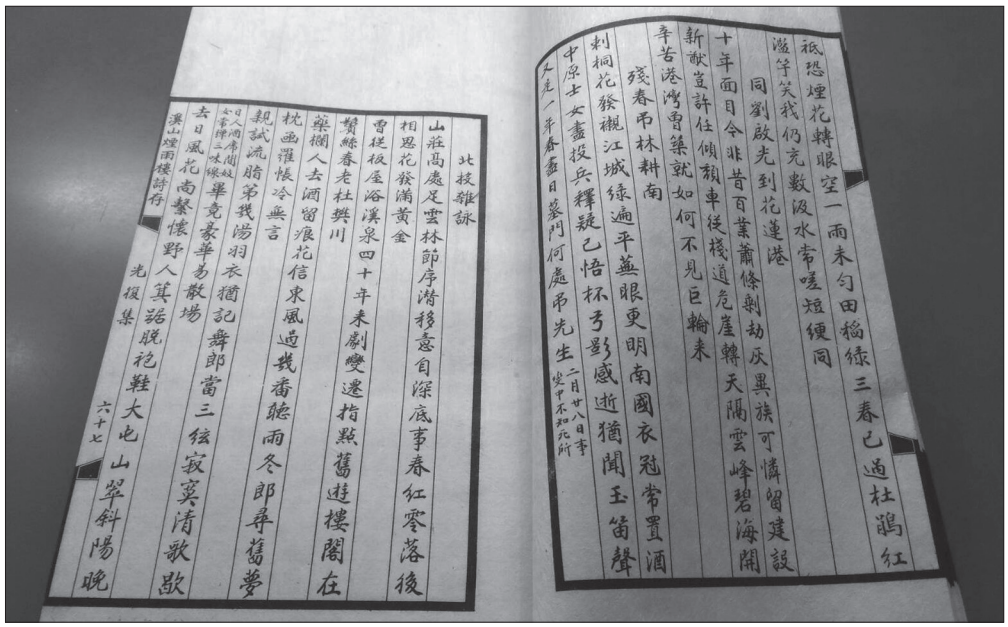


圖七　陳逢源，《溪山煙雨樓詩存》（台北：出版者不詳，1962），頁64。

「歷史記憶」呢？恐怕都還得在兩者的擺盪外，期待更多的研究者再去尋求每一種陳逢源面貌的可能性。

陳逢源固然有其令人訾議、無可迴避的責任，我們也無須替其塗脂抹粉；可是如果同處那樣無法掌握自身命運的時代，為了提高生存的機會，我們是不是有把握能夠自處得更妥當，或避開陳逢源所犯下的「失誤」？研究者眼中的「欺瞞、扭曲與背叛」，或是人們所推崇的所謂「左右逢源，福慧雙修」，事實上背後映射的往往都是時代的荒謬，荒謬之所以存在，究其根源就是來自大環境的「殖民」強權與「黨國」體制的暴力；進一步說，如果持續無視於背後制度及結構的罪責，那麼即使是像陳逢源這樣一位集漢詩創作與金融擘劃於一身的本土人士，最終在歷史定位上仍舊不免要淪為政權的「受害者」。

雖然「時代」與「環境」將陳逢源這位歷史人物塑造成前後截然不同的典型人物，可是當個人命運與大的歷史趨勢形成一定的典型性關係時，陳逢源個人一生的際遇除了見證強權時代的縮影外，事實上「陳逢源研究」也代表著台灣人長期身處眾多帝國的夾縫中所要面對的共同課題。可是，先前由國家圖



圖八　陳逢源，《溪山煙雨樓詩存》（台北：出版者不詳，1962），頁66。

書館延聘專家策畫及出版的《台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136] 乙書，很意外地竟「缺席」了陳逢源，這麼大的「缺失」當然是編纂單位一次純屬偶然的無心之過，[137] 冀望其再版時能及時彌補，否則果真少了陳逢源一人，台灣史等於出缺了一大塊拼圖，這回不只陳逢源淪為政權的「受害者」，我們同時也失去一次自我省視身世的機會，更成了另類的「受害者」。

136 此書厚達800多頁，除台灣本土出生外，其他連清朝時期曾在台任職的文武官員皆鉅細靡遺網羅在內，共計介紹1800餘人。根據成書時的館長莊芳榮所言，此書秉持編著「工具書」之職責為念，過程中並曾特聘多位院士、學者專家為編審委員，長期投入不少人力物力，見〈莊序〉，收於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輯，《台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台北：國家圖書館，2006.12），頁Ⅰ-Ⅱ。

137 其實之前不少有關台灣「名人傳」的書冊裡都會收入陳逢源，譬如（1）張炎憲、李筱峰、莊永明編，《台灣近代名人誌》第一冊（台北：自立晚報，1987.01），頁93-106；（2）高麗鳳總編輯，《台北人物誌》第一冊（台北：台北市政府新聞處，2000.11），頁212-219。

參考資料

一、陳逢源著作（按出版時間排序）

（一）專書

《台灣經濟問題の特質と批判》（台北：臺灣新民報社，1933）。
《新台灣經濟論》（台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
《新支那素描》（台北：臺灣新民報社，1939）。
《台灣經濟と農業問題》（台北：萬出版社，1944）。
《溪山煙雨樓詩存》（台北：出版者不詳，1962）。
《南都詩存》（台南：自印本，1972）。
《溪山煙雨樓詩存》（台北：龍文出版社，1992.03）。

（二）報刊著作（按出版時間排序）

〈亞細亞の復興運動と日本の植民政策〉，《台灣》4年1號（1923.01.01），頁18-33。
〈對台灣青年之希望〉，《臺灣民報》1號（1923.04.15），頁2。
〈陳逢源氏的供述〉，《台灣民報》2卷16號（1924.09.01），頁16。
〈最近之感想（二）我的中國改造論〉，《臺灣民報》120號（1926.08.29），頁8-10。
〈答許乃昌氏的駁中國改造論〉，《台灣民報》130-133號（1926.11.07-11.18）、135-137號（1926.12.12-12.26）、139號（1927.01.09）。130號，頁11-12、131號，頁11-12、132號，頁10-11、133號，頁11-12、135號，頁8-9、136號，頁11、137號，頁11-12、139號，頁12-13。（說明：第134、138號，當期沒有刊載）
〈討究渭水君的理論的重大矛盾〉，《台灣新民報》358號（1931.04.04），頁5。
〈對於台灣舊詩壇投下一巨大的炸彈〉，《南音》1卷2-3號合刊本（1932.01.17-02.01），頁129。
陳逢源、陳逸松對談，〈解剖物價問題〉（日時四月二十七日夜地點政經報本社樓上），《政經報》2卷5期（1946.05.10），頁6-7。
〈一枕〉，《公論報》，1948.12.12，6版。
〈時局感言〉，《公論報》，1949.01.19，6版。

〈重九日草山溪山煙雨樓雅集〉，《公論報》，1949.11.09，6版。
〈近感於事賦呈李萬居先生郢政〉，《公論報》，1952.09.19，6版。
〈詠近事似李萬居先生〉，《公論報》，1955.07.17，6版。

二、專書

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主編，《第七屆全國台灣文學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0.11）。
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4.12）。
王振寰、瞿海源主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99）。
台灣省諮議會編著，《台灣省參議會、臨時省議會暨省議會時期史料彙編計畫：李萬居先生史料彙編》（台中：台灣省諮議會，2001.12）。
台灣總督府，王乃信等譯，《台灣社會運動史・第二冊：政治運動》（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06）。
巫永福，《我的風霜歲月：巫永福回憶錄》（台北：望春風文化事業公司，2003.09）。
李筱峰，《林茂生・陳炘和他們的時代》（台北：玉山社，1996.10）。
周婉窈，《日據時代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北：自立報系文化出版部，1989.10）。
林莊生，《懷樹又懷人》（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2.08）。
林瑞明，《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賴和研究論集》（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93.08）。
林獻堂著，許雪姬編註，《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台北：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4.04）。
高麗鳳總編輯，《台北人物誌》第一冊（台北：台北市政府新聞處，2000.11）。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輯，《台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台北：國家圖書館，2006.12）。
張炎憲、李筱峰、莊永明編，《台灣近代名人誌》第一冊（台北：自立晚報，1987.01）。
陳培豐，《想像和界限—— 台灣語言文體的混生》（台北：群學出版公司，2013.07）。

陳逢源先生治喪委員會編，《陳逢源先生紀念集》（台北：陳逢源先生治喪委員會，1982）。

陳萬益，《台灣文學論說與記憶》（台南：台南縣政府，2010.10）。

陳翠蓮，《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台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2008.08）。

———，《百年追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卷一自治的美夢》（新北：衛城出版，2013.10）。

曾健民撰述，《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放膽兩岸波濤路》（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11）。

游勝冠，《殖民主義與文化抗爭：日據時期台灣解殖文學》（台北：群學出版公司，2012.04）。

黃富三、陳俐甫編，《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台北：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1991.07）。

黃頌顯編譯，《陳逢源選集》（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6.10）。

楊瑞先，《珠沉滄海——李萬居先生傳》（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04）。

楊錦麟，《李萬居評傳》（台北：人間出版社，1993.11）。

廖振富，《台灣古典文學的時代刻痕：從晚清到二二八》（台北：國立編譯館，2007.07）。

賴和著，林瑞明編，《賴和全集・小說卷》（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06）。

———，林瑞明編，《賴和全集・新詩散文卷》（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06）。

———，林瑞明編，《賴和全集・漢詩卷》上、下（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06）。

———，林瑞明編，《賴和全集・雜卷》（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06）。

謝國興，《陳逢源：亦儒亦商亦風流（1893-1982）》（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2.06）。

鍾理和，《鍾理和日記》（高雄：財團法人鍾理和文教基金會，1996.10）。

龔顯宗，《台灣文學家列傳》（台南：台南市立文化中心，1997.05）。

三、論文

（一）期刊論文

王曉波，〈「治警事件」的二志士：敬悼陳逢源與蔡培火先生〉，《中華雜誌》235期（1983.02），頁44-47。

朱伴耘，〈反對黨！反對黨！反對黨！〉，《自由中國》16卷7期（1957.04），頁222-224。

范　雲，〈政治轉型過程中的婦女運動：以運動者及其生命傳記背景為核心的分析取向〉，《台灣社會學》5期（2003.06），頁133-194。

陳明成，〈祕境與棄兒——初步踏查《公論報》藝文副刊〉，《台灣文學研究》7期（2014.12），頁65-125。

———，〈側論早期的「李萬居／《公論報》現象」——以戰後三次的「藝文」刊評及其歷史脈絡（1945-1957）為考察對象〉，《台灣文學研究學報》23期（2016.10），頁211-254。

陳建忠，〈反殖民戰線的內部批判——再探「賴和與台灣文化協會」〉，《台灣史料研究》19號（2002.06），頁178-197。

張炎憲，〈浪漫之情與財經之才——陳逢源〉，《台灣文藝》總號92期（1985.01），頁188-196。

藍士博，〈台灣知識分子的形成與轉折——以陳逢源（1893-1982）為例〉，《台灣史學雜誌》15期（2013.12），頁73-94。

（二）學位論文

李貞瑤，〈陳逢源之漢詩研究〉（台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陳信行，〈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國族認同之轉折——以林獻堂、葉榮鐘、陳逢源三人為例〉（台南：台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曾巧雲，〈往返之間：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的中日移動經驗與夾縫地理〉（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

藍士博，〈日治時期台灣印刷媒體「世代」的誕生暨陳逢源個案研究〉（台北：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蘇瑞鏘，〈「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之研究〉（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三）研討會論文

藍士博，〈從「差序」到「對立」：戰爭時期台灣旅人陳逢源的中國遊記〉，「第一屆東亞文學與文化年輕學者國際研討會」論文（東國大學韓國文學研究所、日本名古屋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台灣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政治大

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聯合主辦，2010.02.08）。

三、報紙文章（按發表時間排序）

蔣渭水，〈御用學者的妄論〉，《臺灣新民報》364號（1931.05.16），頁5。

謝德錫，〈辦報論政的「魯莽書生」李萬居〉，《民眾日報》，1987.11.18，11版。

四、電子媒體

〈台灣省議會大事記〉，「台灣省諮議會」官網（來源：http://www.tpa.gov.tw/opencms/digital/area/chronicle，檢索日期：2017.01.18）。

藍士博，〈國民身分的代價——以陳逢源（1893-1982）個案談戰後台灣人的中國人形象與文化認同〉，《文化研究雙月報》125期，2012.02.25（來源：http://www.csat.org.tw/journal/Content.asp&JC_ID=562，檢索日期：2015.11.17）。